

【论 文】

怎样认识 10 至 1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¹

江 湄²

摘要：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本文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尤其着重指出，“征服王朝论”和“唐宋变革说”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两种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宏观历史解释模式，皆不足以解释和说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再扩大和再统一，我们必须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才能对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做出更有信服力、更有时代感的论述。

一、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

10至13世纪，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形成历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在唐朝文化的养育下纷纷立国，进取中原，谋求成为中国之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有着自觉而强烈的民族意识，辽与北宋对峙百年，金进据中原，最后，北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重新实现了“天下一统”，这是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的元朝，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秩序、“中国”意识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叙述、建构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困扰人心、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终元之世，围绕辽、宋、金三史编纂的体例，扰攘不已，纷争难平，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认识由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王朝在中国史上所处的地位？怎样认识这些王朝的文化倾向和特点？怎样认识元朝与这些王朝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是怎样认识和安排元朝在中国史上的位置？事实上，这一争论贯穿于此后的全部中国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之中。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或以“华夷之辨”的立场，或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或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视角，或从中国传统王朝史的视角，或从内亚游牧国家之历史发展的视角，或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或从全球史的视角……各有各的动机和目的，各有各的所见和不见，始终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也互相交叉、影响。我试图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一番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³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

¹ 本文刊载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²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³ 本文的这一提法受到汪晖《蒙元史叙述之难敞开了重新理解历史的可能性》一文的启发。参见汪晖：《蒙元史叙述之难敞开了重新理解历史的可能性》，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73-77页。

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¹

二、“华夷之辨”还是“各与正统”？²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九月望日，一群儒士文人聚集于汉人世侯严实治下的东平府，讨论是年元月灭亡的金朝“将来国史何如”。这些汉族士人都是在金朝政权下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金朝怀故国之情，对辽、金历史抱有责任感。其中论辩的主角修端自称燕人，来自原辽朝的燕地，更是久处“夷狄”之中。他首先要反对的，就是那种把宋朝当作这一历史时期之“正统”的看法和观点，按照这样的观点，辽、金历史就得作为“偏据”、“僭伪”成为《宋史》“载记”的一部分，就像唐朝修《晋史》时把胡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写入“载记”一样，这是这些北族王朝的儒士绝不能接受的。修端指出，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对唐朝统一结束之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所以，应以五代史为《南史》，辽史为《北史》，统一了中原的北宋可为之作《宋史》。这样一来，与宋朝相比“僻居燕云，法度不一”的辽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就与“元魏北齐”相当了。对于金朝，他强调，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继承的是辽的“大统”，与宋不存在君臣关系，所以不存在“篡宋”的问题。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宋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他一方面说，那种认为靖康之后宋统已绝的说法，和把金史作为宋史的“载记”一样，都是偏颇之论，但实际上，他其实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看待“敌国”南宋的，心中仍充满着金宋世仇的意识，他驳斥金朝灭亡是宋朝复仇的说法，说金朝的灭亡完全是“大朝之力”，而南宋扮演的角色是极其不光彩的，是“自撤藩篱”，“昧唇齿之理”，必将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取笑万世，何复仇之有！”又特别指出王通所著《元经》将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归于“中原”即北魏，这其实是暗示“奄有中原三分之二”的金朝才是正统！³

这就要说到辽、金治下汉族士人的政治、文化意识。辽朝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汉族世家大族在辽朝有着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甚为契丹朝廷倚重，他们以君臣纲常淡化了华夷之辨，辽金易代之际，燕地一度回归宋朝，但当地的汉族大族却多不愿意出仕，而当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后，他们则纷纷主动出头效力，这一状况很能说明辽、金统治下的汉族士人一般的政治、文化倾

¹ 近些年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和框架，重新认识“中国”及其历史形成，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个议题的出现，与西方学术界的某些思潮、热点有着密切关系，更与现实中国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相关。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23页；《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序言《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卷首；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绪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33页。

² 关于元代围绕宋、辽、金三史编纂所进行的“正统”之辨，前人研究成果甚多，重要者如：饶宗颐：《中国史上之正统论·通论（九）金、元及明初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49-56页；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第二章《元代史学的民族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88-110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食货月刊》复刊2卷8期，1972年11月；爱宕松男：《辽金宋三史的编纂与北族王朝的立场》，东北大学《文化》15卷4号，1951年；陈学霖：《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等等。本节综述诸家之说并略陈己见。

³ 修端：《辨辽宋金正统》，苏天爵：《元文类》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589-592页；修端：《三史正统论》，王恽《玉堂嘉话》卷8，“元明史料笔记从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70-173页。关于此文之系年学界颇有分歧，李治安《修端〈辨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论考述》考定为太宗窝阔台汗六年（1234），本文从其说，《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46页。

向。而自认为“中国”的宋朝人对辽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士人则抱持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称之为“北人”、“汉儿”，甚至在情感上比之对于真正的夷狄更加蔑视和隔阂。¹ 金朝自世宗、章宗以来大兴文教，制度、文化渐成规模，产生了“金朝文化”的自觉，代表人物如元好问，其文学风格自觉继承唐朝传统，并批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风格，显然，金朝文化并不甘心成为宋朝文化的影子或学徒，而是表现出以“唐”抗“宋”的文化自觉意识。² 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谈到10-13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将之等同于“宋朝文化”的，而必须将以“北人”、“汉儿”为主的辽金统治区的中国文化纳入视野，并进行重估。

修端的这一主张在北方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应。这篇《辨辽宋金正统》先是被王恽（1227-1304）载入《玉堂嘉话》，继而被苏天爵（1294-1352）收入《元文类》，当三史即将开修之时，翰林待制王理又祖述其说著《三史正统论》，引得一时士论纷然。³ 苏天爵自幼“习知辽与金故实”，一向有着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心愿和准备。他对宋、辽、金三史孰为正统的问题十分关切，他编纂的《元文类》不但收录了修端之文，还收录宋本所拟《乡试策问》：“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代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⁴ 当三史纂修工作开始后，他出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与，遂写长文《三史质疑》寄给总裁官欧阳玄。⁵ 可见，他是倾向于修端三史正统论的。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元朝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元顺帝下诏修三史。“南人”名士杨维桢在三史编修过程中写《三史正统辨》，上书史馆，对修端、王理之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论虽没有获得采纳，但影响极大，总结了“南人”的历史观而加以系统阐发。当时实际主持三史撰修的总裁官“南人”欧阳玄赞叹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⁶ 另一位“南人”名士陶宗仪说其文“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本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⁷ 元朝虽然再次实现了“大一统”，但从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来看，分裂时期造成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终元之世并没有能弥合。

与修端之论相对，杨维桢强调，被奉为官学的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已明确规定，不以宋朝接五代之统，而是以宋朝续唐朝之统，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与汉、唐地位相当，都是“大一统”王朝。杨维桢直斥契丹就是“中国之人所不道”的“夷狄”，辽之与宋，正如匈奴、突厥之与汉、唐，根本不能列席于中华国家。对于占据中原百年的金朝，杨维桢不能将之贬为“夷狄”，而是比作三国时的吴、魏，是“割据”、“强梁”、“僭伪”。杨维桢再次搬出朱子，强调《通鉴纲目》尊蜀汉而非曹魏，尊东晋而非北魏为正统，根据《纲目》正统论的“顺逆之理”，南宋当然继承宋朝之正统，所以元朝必须接续宋朝之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汉唐宋相继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序列。他认为，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对这一点有清醒自觉，他当时就“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而那些“北人”士大夫，却“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他质问道：“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从这样的质问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南人士大夫，他对于元朝的批判或者说期待：实现了“大一统”又尊奉“道统”的“我朝”为什么不能以汉唐宋自期，建

¹ 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109-127页。

² 吕正惠：《元好问的贡献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41-151页。

³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0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5675页。

⁴ 宋本：《乡试策问》，《元文类》卷47，610-611页。

⁵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421页。

⁶ 《明史》卷285《文苑传·杨维桢》，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7308页。

⁷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辨”，李梦生校点，收入《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164页。

立一个真正的中华国家呢！杨维桢的正统论并不代表这些“南人”士大夫对元朝不认同而对宋朝有故国之思，但却仍然曲折地表达出他们的民族意识。¹

但是，“南人”士大夫中也有对辽宋金三史及其与“本朝”之关系另有一番看法的著名人士。与许衡齐名的吴澄（1249-1333），既不像刘因那样坚决不仕元朝，又不像许衡那样积极入仕，他对于元朝，可谓“亦有心，亦无心”。²吴澄虽为程朱学派的传人，但却不主张朱子《纲目》正统论，在为隐士郑松《皇极经世续书》所作序中，他说，同为中国正统王朝，自“统”的继承传授来说，各成三个系列：“汉、魏、晋、宋、齐、梁、陈，统代一系；魏、周、隋、唐、梁、唐、晋、汉、周、宋，十代一系也；辽、金、国朝又一系也。”³这就是承认辽、金、元之间的渊源关系，承认唐朝与北魏的渊源关系，以及宋朝与五代的渊源关系，而不是虚构出一个汉、唐、宋、元“正统”相继的理想化历史。这还真是一种历史卓见，从种族、文化、制度的渊源与特点来看，中国史的“统绪”确实是多元的，隋、唐是北魏、北齐、北周等“北族王朝”的继承人，宋朝是以沙陀族军阀为主的五代政权之继承人，而辽、金、元又是另一个系列的“北族王朝”。根据吴澄的经历，这种历史观乃是他现实经验、心境的反映，“国朝”确实是一个不改“夷狄”本色的“中国”。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右丞相脱脱奏请编修三史，得到顺帝支持。对于纷攘不已，迁延日久的三史正统问题，脱脱作了一个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⁴正如不少学者所论，三史独立成书，“各与正统”是有着重要思想意义的。金毓黼指出，这其实仍然是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正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自比于完成“大一统”的唐朝。⁵瞿林东指出，三史正统之辩，其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如何看待和评价各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而三史“各与正统”表明元朝同时是辽、金、宋三朝的继承者，它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平等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无疑更加符合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⁶

明朝建立之初，纂修《元史》的儒士文人皆当时名士，他们大多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强调明朝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奉天承运”继承元朝，因此也并不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看待北族王朝的历史地位。如王祚（1322-1373），于洪武元年与宋濂同为修《元史》总裁官，其所著《正统论》，既反对《通鉴纲目》的正统论，也反对“北人”士大夫引据的《元经》，主张只有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才算正统，无论蜀汉还是曹魏，无论东晋还是北魏，都不足以当正统之名，按照这个原则，金宋对峙，南北分裂，其事“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当元朝灭宋再次完成天下一统，复绍“正统”。⁷修《元史》诸臣中只有胡翰持“华夷之辨”以论正统，其所著《衡运》、《正纪》，历数周秦汉晋隋唐宋，上不及北魏，下不列元朝，将北族王朝尽悉排摒于中国正统王朝之外。⁸其后，方孝孺（1357-1402）继承发挥胡翰思想，著《释统》三篇和《后正统论》，三代以下，仅汉唐宋为正统，元朝作为乱华的夷狄之主被摒弃出正统，不再允许其“进于中国”，更遑论辽、金。但方孝孺意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观即使在标榜“恢复中华”的明初，依然是惊世骇俗的：“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

¹ 同上，6164-6169页。

²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64页。钱穆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元明之际南人儒士大多不存华夷之辨、民族意识，反而心系元朝，以隐居不仕为尚。

³ 吴澄：《皇极经世续书序》，《吴文正公集》卷16，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400册，58页。

⁴ 权衡著，任崇岳笺注：《庚申外史笺注》卷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44页。

⁵ 金毓黼：《宋辽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2页。

⁶ 瞿林东：《辽宋金三史略论》，《中国史学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230-240页。

⁷ 王祚：《王忠文集》卷4《正统论》，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409册，532-533页。

⁸ 胡翰：《胡仲子集》卷1《正纪》，“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4页。

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¹自此之后，重申“华夷之辨”的思想兴盛起来，将辽金元摒弃出“正统”王朝的历史观成为主流思想，以两宋为正统来重写10至13世纪历史的史书纷纷出现，最有名的当属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然而，明朝终亡于女真后裔清朝之手，清朝建立之后，又为自北魏至辽、金、元的北族王朝正名，将之全部纳入中国正统，经乾隆皇帝钦定，辽、金二史列入“二十四史”，等于重新承认了元修三史时“各与正统”的历史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三史“各与正统”是“最有理者”，“诚定论也”。又说王洙《宋史质》乃“病狂丧心”，柯维骐《宋史新编》“大纲之谬如是”。²

辽、金、元这一系列的北族王朝将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制度纳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不同于秦汉隋唐的新的“大一统”国家模式。可以说，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相对于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说，毋宁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正统”乃是天下公器，不为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所私，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这样的思想观念蕴含的是包容并有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异质性并存的“中国”意识，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

三、“汉化史观”与“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宋辽金史

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和元、清“各与正统”的正统论，并没有随着王朝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它们各自以新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中国的认同意识的深层。大略而言，民国学界的中国史观继承了“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史观更是对“各与正统”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的继承与发扬。

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运动中，面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产生了“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的思想观念以及历史论述，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国族”意识，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上有着莫大的意义，也使得中国史学开始从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形成的视野去重新考察中国历史进程。³今天已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国民党及其周边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思想和政策上，大都倾向于以汉族为中心而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以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只是“同化”更是在平等融合意义上使用，并不存在汉族独尊之思。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之概念，并首先引介“民族”观念进行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叙述。⁴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史的论著纷纷出现，影响较大者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柳诒徵《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张其昀《中国民族志》等。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撰述，基本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血统上现代诸民族都是混杂的，但在文化上却在渐趋同化，而文化同化的方向就是“汉化”，这一同化趋势与中国历史相始终，按此趋势，未来中国各族熔铸为“中华民族”时，也一定是以其他各族同化于汉族而完成的。有学者指出，自梁启超以来的中国学者已经察觉到，欧洲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以及现实不和，可能的解决之道不外两种：一是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其二，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的传

¹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后正统论》，徐光大点校，宁波出版社，1996年，58页。

² 《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别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454-455页。

³ 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128-141页。

⁴ 陈其泰等：《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四卷《导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33-47页。

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而梁启超以来民国的中国民族史论述走的是第一条路。¹

民国时期的宋辽金史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观。存在的突出问题：一、辽金史一直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研究和讲授宋史的学者，往往把辽金二史当做附庸。事实上，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把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提及，1979年出版的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辽夏金卷》算是首先给予辽、夏、金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²二、当时的学者以古况今，把宋辽、宋金战争与抗日战争相比附，以宋自居，以辽、金、元为“外国”，这是当时关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³三、学者们多把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趋势说成是“汉化”。姚从吾是民国时期以及台湾研究辽金元史的重要学者，其文《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统观国史演进，以大唐帝国瓦解之年为界，可区分为两大阶段，在这之前，秦汉、隋唐，俨然两个罗马帝国，但自907年以后，边疆民族入侵不断，杂居混合，激动起若干新的变化。然其结果是，边疆民族皆无例外地依次接受了中原儒教的文化，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⁴辽金史大家陈述于1948年出版的《契丹史论证稿》中一方面指出“国史中之北系文明”及其影响，一方面强调契丹、女真如同鲜卑族一样，最后同化于汉人，泯然无痕迹可寻。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明确认识到，辽、金、元与此前的北族王朝在国家形态和文化性格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与汉族王朝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辽、金在中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吕思勉指出，辽、金、元、清之入主中原，和前此的“五胡之乱”性质乃大不同。“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而辽、金、元、清皆以国家的资格侵入。尤其重要的是，自辽以后，北方民族不再自托于黄炎子孙，可见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汉族的“民族主义”亦因民族斗争的失败而发扬彰显。⁶其论与当时持“宋代近世说”的宫琦市定相近。钱穆特别强调了辽、金、元三朝并没有真正“汉化”，而自有其民族意识、文化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辽之立国，实“中国史上一种空前未有之大摇动”。安史之乱以来，东北部地区长期割据，这一地区的汉族逐渐与“异族”武力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国家。由于长期的政治稳定，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的民众，早已忘却他们的“祖国”，而自有其国家意识；金朝入主中原后，女真族上下虽已渐染华风，但其统治者仍抱持深挚的“种族之见”，政策措施皆有民族差别；蒙古族继起，中国史第一次整个受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之统治，而元朝始终未接受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观念，始终不脱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⁷金毓黻指出，国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转折，凡有三时期，其一为秦汉，其二为隋唐，其三为宋辽金时期，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辽朝明确设立二元的南、北面官制，且以北面官为主，金朝化二元制度为一元，元朝因之。而金朝之尚书令及左右丞相，元朝之中书右丞相，皆继承辽朝的北院枢密使之制。金、元其实是采取隋唐以来的政治制度，而改易其面目，将“北系之彩色”寓于其中。明朝号称“兴汉灭胡”，但其

¹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导论《走出族群看华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8页。

² 参见宋德金：《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144-158页；陶晋生：《民国以来辽金史研究的回顾》，《宋辽金史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35-52页。

³ 如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缪凤林《宋高宗与女真议和论》，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以及傀儡组织》、聂崇岐《北宋——中国政治史上南北势力消长之关键》，等等。见宋德金：《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144-158页。

⁴ 姚从吾：《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东北史论丛》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1-27页。

⁵ 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11页。

⁶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26页。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于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中国民族演进史》于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初版。

⁷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512-517、620、662页。

政治制度沿袭元朝，满清更不必论，民国亦蒙其影响。¹ 这一见解是很精辟的，它强调了中国史的划时代变化是因北方民族的兴起而发生的，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趋势并非“汉化”所能完全说明，而是中原农耕世界的文化、政治传统与北方民族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中国革命包含着对于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深刻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强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尊严。新中国建立以后，关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形成，是历史学界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热点，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相关问题引起热烈的争鸣和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成果的观点原则。在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讨论中，白寿彝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打破那种以历代皇朝疆域为“中国”的观念。² 的确，正如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批评一样，这样的观点目的论色彩太重，似乎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形成，但是，它打破了那种自觉不自觉地以汉族王朝为中国、从而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的历史观念，其实那是“华夷之辨”正统论在现代史学中不自觉的但却强固的遗存。³ 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谭其骧继续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不能等同于汉族王朝，甚至也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而是要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⁴ 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并贯彻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之中。以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疆域为“中国”的标准，意味着将历史上凡是自称“中国”以及最后纳入“中国”的民族及其政权都看作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纳入“中国史”的范畴之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各与正统”的影子。从理论上说，这其实是反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普世性，不采用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框架，而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

1988年，费孝通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泰纳讲演（Tanner Lecture）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年，他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版，1999年，又出版此书的修订本。他的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新时期以来认识现实中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之历史形成的思想原则。在这部著作中，费孝通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观叙述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开端时期”包括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北方民族走上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中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称谓。隋唐辽宋金是“发展时期”；在10至13世纪，辽金王朝把州县制度推广到东北地区，牧区则推行仿唐代藩镇又结合游牧民族特点的部族节度使制度，辽金两代的“皇帝”已经是兼具农牧两大类民族的国家元首之称号。元明清进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中央政权直辖区域扩大到牧区，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中国农牧两大类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⁵ 马戎说，费孝通在1991年9月一次谈话中曾指出，许多民族都曾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核心”，如元代的蒙古族、清代的满族，

¹ 金毓黻：《宋辽金史》，4-6页。

²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³ 何兹全在《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发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指出这个问题，后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写于1960年，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写于1962年，发表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6期）也都赞同白寿彝的主张，并讨论了相关问题。

⁴ 谭其骧的讲话后来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为题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34-42页。

⁵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4-109页。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宁有族乎！¹ 这一被马戎称为“在理论上非常重要的突破”，不就是“各与正统”的现代回响嘛！

在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原则指导下，1949年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更加重视和强调辽、金、夏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对它们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文化面貌的特色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学者都指出，辽、金、夏政权积极开发广大边疆地区，长城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空前发展，“华夷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此奠定基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改造和移植中原王朝的礼法制度，创造了一国两制和一国多制的国家模式，这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² 对辽夏金文化的认识也突破了“汉化”的框架。如蔡美彪论述说，辽文化有三个系统，一是契丹族的文化；二是突厥系的文化，北面官制基本上是承袭突厥、回纥的制度，又结合契丹族的实际，借鉴汉族的某些制度，经过修改而订立的。西辽能在中亚建立起对突厥系部落的统治，这和辽文化中一直含有突厥系文化成分是有关系的；三是汉族的唐文化，构成辽文化的汉族文化，并不是宋文化而是燕云地区的唐文化，南面官制基本继承唐制。而影响辽朝的唐文化不只是来自汉族，也还来自渤海。辽代的各个文化领域以佛教为核心，学术、艺术、建筑以至雕版印刷等都随着佛教的兴盛而达到独特的成就。西夏虽然也受到唐宋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夏文化基本上是以吐蕃文化为核心又具有党项的特点；金朝则随着女真人的汉化而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带有女真特征的金文化。³

然而，1949年以后以及新时期以来，关于怎样认识和评价10至13世纪的民族战争，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有关历史人物，仍然充满争议，而且牵动情感。1987年，辽金史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都同意辽、金是两个重要的“北朝”，在国史上应与宋朝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关于辽宋尤其是宋金之间的战争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辽金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但在当时乃是外族和外国，辽金与宋的战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有人认为，辽金对宋战争是契丹、女真对于汉族的掠夺战争，西夏对宋的战争则是掠夺和分裂战争；有人认为，不能把辽金看成异族敌国，当时的战争是各族统治者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还有人认为，不能用“民族斗争”来看待辽宋、宋金战争，辽金政权事实上是以契丹、女真为主体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们之间的战争更合适说成是割据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人说，岳飞是宋代汉族的民族英雄，但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岳飞式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加以分析，里面有忠君思想和大汉族主义，而研究宋史的学者则很不满意这种说法。⁴ “中国”的历史形成充满了各民族之间血与火的斗争，这使后人难以统一的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这个过程中的人物和事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之难”。

金史专家张博泉于1994年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宋德金认为其书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⁵ 他的主要观点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族王朝相比，10至13世纪的辽金夏政权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强自树能力，他们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和制度，为本民族办学校、开科举，他们不是被“汉化”，而是把“中原制度”发展为

¹ 马戎：《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41-46页。

² 如陈述：《要重视辽金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2年8月30日；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4页；宋德金：《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144-158页。虞云国：《试论十到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45-266页。

³ 蔡美彪：《略论辽朝文化的构成》，《辽金元史考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46-149页。

⁴ 参见景爱：《辽金史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历史研究》1982年5期，106-107页；吴泰：《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3期，86-92页；吴泰文，蔡靖夫《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评议》，《北方论丛》1984年6期，16-21页；宋德金：《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144-158页。

⁵ 宋德金：《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144-158页。

包括各民族制度、文化、习俗在内的、具有多元性的新的统一制度，从后见之明看，这样一种伟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历史赋予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任务。于是，元朝的统一便不同于秦朝的统一，我们今天应当把这两种不同格局和模式的“统一”区别开来，元朝和后来的清朝实现了将多种民族、制度和都包容进来的“统一”，建成了真正“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而现在的中国正是对元、清式的统一国家的继承和发展。张博泉批判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认为他承袭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其思想实质正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通，无非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就是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辽金不是中国，宋才是中国，元朝的统一其实是中国已经亡于蒙古。¹ 不过，在我看来，张博泉显然是吸收了“征服王朝论”的某些内容，转而用之论证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

认识中国历史，不是站在汉族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是打破长城的界限，把北方草原和中原南方连成一体，认清其结构性关系，这本来是新中国大力倡导的“多民族史观”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新中国主流学界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传统，对任何从内亚立场对北族王朝进行的研究，都十分警惕和排斥。无论怎样合理地定义“中国”的疆域，中国史长期以来都被当作一种“国别史”，并在“国别史”范畴下对北族王朝的历史进行民族史或断代史意义的研究。这样一来，以北方草原民族为本位，对长城以北地区以及民族之历史的认识，就显得不足和单薄。所以，尽管强调“互动”，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但是中原农耕地区的“核心”作用还是大大强化，而北方民族主动参与和塑造中国史的历史还是模糊不清。

四、面对“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

欧美和日本学界看待北族王朝的“内亚史观”，其背后有着“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甚至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分裂、殖民中国的政治野心瓜葛不清。² 民国时期、1949年以来，尽管这个领域的学者或隐或显地受到内亚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但总的来说，主流中国学界始终对这一学术立场和观点持警惕和抗拒态度。但是，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崛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中国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开放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待中国与周边亚洲地区的关系，中国学界也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和开放性的眼光去面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传统，去吸取其中的学术资源。近些年来，“内亚史观”算是对中国史研究宏观层面影响最大的理论范畴之一了，“新清史”掀起的轩然大波就是例证，有学者就这个现象说：“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³ 有学者甚至提出：“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⁴

首先受到中国学界重视和重新阐发的西方学者是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并沿长城进行实地考察，在四十年代抗战

¹ 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第一章、第二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3-30页。

² “内亚”这个首先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学术术语，所涵盖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大致指的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游牧民族的活动舞台。关于这个概念及其在欧美与日本学界的使用情况，请参见钟焯：《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导论，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1页；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144-159页。

³ 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8-115页。

⁴ 钟焯：《“内亚视角”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8日。

期间，他受罗斯福总统委派出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与当时中国政学两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交游，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二年即以《中国的边疆》为名翻译为中文。200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此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08年、2010年、2014年重印。¹ 中文译者唐晓峰指出，在西方学术界，是拉铁摩尔首先系统论说了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长城地带就是这两大对立的世界中间生长出的辽阔边境，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中心。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可以矫正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让我们去思考长城地带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² 201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黄达远和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姚大力著文介绍这部论文集说，它反映出人们在当代历史状况下对拉铁摩尔的再发现和再思考，他批评中国民族史和断代史研究并没有真正摆脱“汉化史观”的藩篱，基本上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秦汉时期确立的国家模式不断被复制和向外延伸，即使对于元、清这样起源于内亚边疆的王朝，也把它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统治者能主动“汉化”，其失败在于不够“汉化”，而拉铁摩尔的学术理路却在于“从边疆发现中国”，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³

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正是在拉铁摩尔的影响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⁴1949年，他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出版，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民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两种类型，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不同，“征服王朝”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同时，精心维持着北方根据地，并形成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具有民族本位意识，不是单向地被汉族文化同化，而是双向地“涵化”形成“第三种文化”。他还进一步指出，辽朝和元朝有受到限制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抵抗者型”，而金朝则有比较大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屈服者型”，清朝属于“中间型”。⁵ 当今的中国学界虽然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说”接受度越来越高，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仍然并不愿意使用“征服王朝”这样的概念，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文化变容”或“文化涵化”的理论，突破“汉化”思路，重新考察和探讨辽、金、元时期文化冲突、文化的双向采借，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深远影响。⁶

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上承“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满鲜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征服王朝”的历史论说，它与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和情感冲突很大。上世纪初，日本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的“满鲜史”研究，并将辽金元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下进行阐释。“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以及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他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

¹ 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5-58页。

²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124-128页。

³ 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第8期，28-34页。

⁴ 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69-70页。

⁵ 魏特夫著，苏国良译：《中国辽代社会史 907-1125，总述》，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1-69页。

⁶ 参见陶晋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省思：以宋辽金时期为例》，《辽金两代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同化的再思考》，收入《宋辽金史论丛》；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收入《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收入《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的范畴。这就把中国的对立和分裂看成是常态，而把长城内外的统一看成是变态。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在强调辽乃至金、元、清的内亚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满鲜史”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热烈响应，这使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征服王朝”论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¹不过，正如吉田顺一所说，在日本积累而来的“征服王朝”论，具有魏特夫理论完全看不到的倾向，他们把“征服王朝”看作是独立的“北亚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游牧国家”到“征服王朝”，正是“北亚”世界由古代向中古的转变。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对这种带有新倾向的日本“征服王朝”论进行了体系性的论述。²比之“征服王朝”说，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认为它根本不能置于中国史序列之中。³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⁴

西方“内亚史”研究产生自欧洲的东方学，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二战后欧美的内亚史研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不再将内亚草原世界看作是野蛮世界，而是将之看作一种独特的文明传统，自身有着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摆脱了过去注重考证的东方学传统，注意吸收、借鉴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对内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南北社会互动的历史规律进行归纳和建构。⁵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 1950-）于1989年出版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该书中译本于2011年出版，中文译者袁剑指出，在拉铁摩尔之后，巴菲尔德提出了对中国边疆史加以整体性解释的又一种主要模式，更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内亚草原国家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依存关系。⁶他将中国定义为“原生型帝国”，而把草原帝国定位为与原生型帝国进行互动而随后出现的“次生型帝国”，其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经济资源要依赖于原生型帝国，一旦原生型帝国瓦解，如影随形的次生型帝国遂因丧失经济支柱而与之同归于尽。巴菲尔德在其书《导论》中说：“内陆亚洲是一块有着强烈彼我观念的两个相互对抗的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游牧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映，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而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在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且最集中化的传统定居国家时产生，这一点也不偶然。”⁷巴菲尔德指出，能向南征服“中国”并将内亚游牧世界也囊括在内的大帝国的建立者，往往是生活于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的“东北民族”。这一点，拉铁摩尔也已经认识到了，他曾论述说：“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踞大草原的时候，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忽然出现在大草原的，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草原深处，而是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到金的册封。”⁸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当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处于衰落时，像契丹、女真等“东北

¹ 参见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603-612页；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78-83页；孙昊：《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文汇报·文汇学人》2016年5月6日；

² 吉田顺一：《北亚的历史发展与魏复古的征服王朝理论》，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171-184页。

³ 岛田正郎：《征服王朝乎？胡族王朝乎？》，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226-235页。岛田氏著《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由何天明翻译为中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⁴ 孙昊：《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文汇报·文汇学人》2016年5月6日。

⁵ 钟焯：《“内亚视角”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8日。

⁶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126-131页。

⁷ 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导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9-10页。

⁸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371页。

民族”就会崛起，建立“东北边疆国家”，对中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而以内亚草原为边疆，实行内亚与中原混合的二元体制。巴菲尔德所谓“东北边疆国家”大体等同于魏特夫所称“征服王朝”，但其内涵却与“征服王朝”有所不同，既然“东北边疆国家”形成于中国北疆两种经济区的边缘过渡地带，那么所谓“征服”二字就无从提起，巴菲尔德说：“东北王朝与其是征服者，倒不如说是拾荒者。”¹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东北区域如同一个纽扣，一次次将长城以外和长城以内这两大幅地域扣合起来，而终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国”。

巴菲尔德深受内亚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 1934-1984）的影响，傅礼初较早论述了内亚游牧国家产生于外部刺激，而巴菲尔德对此进行了理论提升。根据钟焯的介绍和论述，内亚史大家、哈佛大学教授傅礼初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他一方面继承了东方学的实证功夫，一方面注重吸收社会科学理论，试图以内亚为中心，从宏观上思考欧亚大陆各地区历史的密切关联和共同趋势。他曾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了关于清属内陆亚洲以及清俄关系的三章，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北美“新清史”研究也深受他的影响。他在1978年发表了长文《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从内亚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总体性的概括，与我们熟知的“唐宋变革论”不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应该从金朝的建立算起，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如行省制度、更强势的军事镇戍制度、专制皇权的强化、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这套制度框架由蒙古人继承下来，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内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和文化特点是要从“内亚化”中寻找原因的。四十年代，金毓黻曾论述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正与傅礼初之观点不谋而合。周良宵、顾菊英于1993年出版的《元代史》也说：“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²钟焯认为，比之“宋-元-明”转型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的解释模式，“金-元-明”转型这一带有内亚视角的解释模式能更好地联接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或许将这两种转型观彼此互补，方能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历史后半期的演化趋势。³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应该是一部能够反映西方内亚研究视角下对辽、夏、金、元时期总体看法的一部著作，其中文译本于1998年出版，在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德国著名汉学家海波所撰写的《导言》十分精彩，他虽然基本上沿用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概念和理论，但同时强调了，尽管每一个征服王朝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至上性及其世界秩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每一个征服王朝都是中国的王朝，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部分。征服王朝的制度、文化、生活具有“内亚性”与“中国性”复杂结合的特点，而正是征服王朝使得中国式的皇权-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各种“化外”政权所采纳和适应。可以将他的主要观点简单归纳如下：一、10-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国，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汉人是重要的组成。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征服王朝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按传统的方式想象成华夷之间即高等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对抗。二、五代以来中华世界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发展出了一种多国体制，但是，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多国体制中，

¹ 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213页。

² 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

³ 钟焯：《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211-250页。

多国共享一套礼仪象征系统，共享“正统”观念和歷史记忆，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但仍然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中华世界，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而西方人对这种基本的中国共同体并不理解。三、在这一时期，内亚文化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度作用和长期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内亚性”与“中国性”深刻结合的特点。¹

当今中国学者之积极吸收、采用“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其意图在于以一种全球史、区域史的叙述策略，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框架，强调这个时代辽、夏、金、元政权的民族主体性、征服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内亚游牧帝国的历史脉络，从而将之从中国王朝史的脉络中解放出来，发掘其社会、文化、政治上难以被传统的中国史叙事回收的那些面相。这样一些尝试，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发掘内在于中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亚洲、世界的历史联系，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观乃至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所无法充分认识到的。但是，无论“内亚史观”还是“征服王朝论”确实又有另外一面，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不太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做是人为的强制的，是不自然、不正当的，这与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是有所冲突的。

五、怎样重新解释 10-13 世纪中国的再统一和再扩大？

“征服王朝论”和“唐宋变革说”是当前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最主要的两种宏观历史解释模式，二者都不足以充分解释 10-13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再扩大和再统一。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唐宋变革说”自觉不自觉地内涵一种仅以中原汉地为“中国”的“中国”意识，日本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或者说“宋代近世说”与日本式的“征服王朝”论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配合关系。提出“唐宋变革说”的内藤湖南（1866-1934）对“满鲜史”用力很深，于 20 年代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近世史》时曾论述说，契丹崛起在东方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一个非中国的又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国家，开启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周边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继之而起建立国家并征服中国，这成为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中国近世史”的主调。² 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的假说，他于 1950 年出版《东洋的近世》，其中“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不能不说是吸收并提升了日本的“北亚史观”和“征服王朝论”。他论述说，辽朝把大本营置于长城之外，坚守国俗，立国二百余年，而与北宋对峙，这是“东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即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在中国以及周边民族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勃兴，西夏、安南、大理国的独立莫不反映了非汉族国民主义的跃动。宋与契丹的对等外交关系，更是说明了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首先出现于“东洋史”。这样一来，“宋代近世说”就完整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出现于 10 世纪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之中了。于是，在宫崎市定看来，元、清两大帝国的出现就是对“东洋史”近代化进程的打断：“东洋的国民与国民对立好不容易才出现。蒙古帝国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又将之抹杀，结果是东洋近世史特征之一的国民主义一时消灭。这点可以认为

¹ 傅海波、崔瑞德等著，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1-43 页。

² 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354 页。《中国近世史》载于《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主要根据 1925 年在京都帝国大学的讲课笔记加以补订。

是东洋史与欧洲史在平行发展线上的背离。”¹

正如汪晖指出，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有一个根本的预设：民族国家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并形成民主体制的基本条件，宋、明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相对单一的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而将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组合在一起的北族王朝阻碍了近代化进程。那么，继承北族王朝之政治遗产和国家理想的现代中国，则是不够“现代”的，它有待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² 宫崎市定“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在当今史学界是相当流行的，很多观点都与之相关，如宋朝产生了含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意识，有了关于“中国”的有限的空间意识；10至13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对等外交关系，东亚世界超越朝贡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国际体系，等等。³ 这些观点在强调了10至13世纪中国史的某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在这个时代自称“中国”的除了宋还有辽、金，激烈的“正统”之争中反映出来的“大一统”观念，比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其实更为重要，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历史动力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近些年来，有一些中国学者积极回应后现代、区域史、全球史、北亚史对中国认同以及中国史内在连续性的挑战，葛兆光是其中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相继出版了《宅兹中国》（由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何为中国》（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来讨论相关问题。在他的中国史叙事中，10-13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宋朝完成了“中国”的文明同一性的建设，有了有限疆域和领土的意识，有了接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华夷之辨”，周边民族也建立了类似的民族国家如辽、金、高丽、西夏、大理、安南、日本，整个东亚已形成一个“国际社会”。然而，由于蒙元和满清两个“异族”王朝的兴起，向“民族国家”转化这一历史大趋势变得相当曲折，而且呈现出与欧洲近代绝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今天的中国既继承了“大一统”的传统理念，又继承了“大清帝国”多民族的国体，其历史“疆域”和现代“国境”，就越来越成为充满争议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下，葛兆光将宋朝的“中国文化”总结出五大特点，认为正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特质，历史上的“中国”才成其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今天的中国也才有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宋朝的那种有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萌芽的“中国”意识又成为后来历史上乃至今天“中国”意识的基础。⁴ 不难看出，这一论述是吸收了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论”，然后回到“汉化史观”并加以充实，可是，这一论述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据京都学派尤其是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宋朝中国进入“近世”的标志即是经济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背后的历史“普遍规律”，就是帝国必然分裂为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乃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正常形态。采用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叙述，无法回避其中蕴涵的这种“普世主义”标准。二、把宋朝的“中国”观当作此后乃至现实中“中国”认同的基础，无疑是以宋朝的自我意识来定义10-13世纪的“中国”，而将辽、金排除于“中国”之外。以宋、明时代凝固而成的“相对清晰稳定”、“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中原-汉族文化为“中国文化”，就必须回到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中心而向四

¹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10页。

²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5-12页。

³ 如贾志扬（John W. Chaffee）：《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99-108页；Morris Rossabi: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中国棋逢对手：10-14世纪中国与邻国的关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第七讲《宋代：列国体制下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73-85页；葛兆光：《“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1-66页。

⁴ 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73-74页，112-117页。

周扩散辐射的中国形成论，回到正统王朝相继的中国史叙事，回到以汉族同化周边民族即“纳四裔于中华”的那种“中国”意识，而这正是中华民国主流的“中国”意识，这样的“中国”意识倒确实是宋朝“中国”意识的延续。而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纳四裔于中华”的“中国”意识，回到中原-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史叙事，其实都是简单地站在以中国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各种解构论的反面，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辩驳，也无法解释这个不合“标准”的多民族、跨文明“大中国”的存在，无法真正解释和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中国很畅销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著述，正好与葛兆光的中国史叙事形成鲜明对照。杉山正明是以全球史视角研究元朝史而著称的，在讲坛社中国史系列中，他写作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概括而鲜明地反映出他对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可以说，他的历史观把“征服王朝论”推向极端，因而也就暴露出“征服王朝论”的问题所在。杉山正明完全站在所谓“征服者”民族的立场上，强调和颂扬辽、夏、金、元的文化、历史成就，同时不切实际地贬低两宋的历史成就，进而贬低整个中国的农耕-儒家文明传统。正如台湾学者吕正惠所批评，他几乎无视中国史上另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始终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农耕区，各种游牧民族最后消失于广大的“汉族”之中，汉族和农耕文明的范围在历史上越来越大。广大的农耕地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相关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心态，构成了我们所说“中华文化”的主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汉族-农耕区发挥着作为中华世界之核心的作用。杉山正明既然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以农耕区为中心的中国如此广大绵延的历史缘由，当然也对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现实存在，感到不解甚至厌恶。¹ 其实，凡主张“征服王朝论”者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倾向。

“征服王朝论”是以北族王朝的统治者民族为历史叙述主体的，关注和强调的是这个统治者民族的主体意识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的深远重大，关注和强调的是作为“征服者”的“异族”带给中国文化的混杂性和多元性。这一历史视野，多少忽略了北族王朝治下真正的主体民族汉族及其士大夫阶级，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政治立场与意识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北族王朝时期的文明创造仍以汉族为主、仍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主似乎强调不够——正是在北族王朝治下，农耕文明的区域极大扩展，汉族人口的范围激剧扩大，如果不强调汉族-农耕文化的核心作用，我们就无法说明中国的“一体”性。我想强调的是，辽、金以降的北族王朝作为“征服王朝”，其实是以“征服”为方式加入、融入中国之中，他们之自居“中国”，他们之积极与汉族王朝争夺正统，他们对于“大一统”的强烈热情和动力，都是明证。清朝四库馆臣当年欲删杨维桢《正统辨》，乾隆皇帝专门写上谕就三史正统问题发表明确看法：“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起于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² 这意味着，所谓“征服王朝”发展到清朝，它的统治者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做“北族王朝”的继承者，而完全以正统相继的中国“大一统”王朝自居。

“征服王朝论”和“唐宋变革说”有一种既相互配合又彼此隔膜的关系，我们需要突破这种关系，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也就是说，要以“汉化史观”兼容“内亚史观”，从而对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做出更有信服力、更有时代感的论述和解释，从而真正说明虽“多元”而能“一体”的中国的历史形成。

¹ 吕正惠：《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亚洲现代思想》第1辑《重新讲述蒙元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389-411页。杉山正明著《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4年出版。

² 清高宗：《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维子集》卷首。

【论 文】

探寻“多民族中国”的可能性

——“民族研究”的“本土化”实践¹

王 娟²

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民族研究”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领域。与其关系最近者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³但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等亦都与之具有相当紧密的关联。诸学科介入“民族研究”的视角有别，采用的方法各异，甚至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亦颇不相同，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进程。如何在一个内部多元的“王朝”废墟上重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这实际上构成了不同学科的几代民族研究者共同的问题意识。

一、复杂的遗产：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国家化”民族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与民族研究关系密切的社会学、人类学被取消学科建制，而“民族学”则在将自身的目标重新定义为“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服务”后得以保留。这一变化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民族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国家化”烙印。

作为新中国的民族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引领者，费孝通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是说：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国家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种需要向学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要求他们对当时了解得很不够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这项工作当时即称作民族研究。……后来民族研究又被称为民族学。这是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⁴

这项任务在当时具体化为两项规模宏大的社会调查工作：“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者的最终成果是一份包含“56个民族”的名单⁵，并将中国超过99.9%的人口分配到了这个名单所列的民族类别中⁶，从而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标准，完成了对中国各民族的“社会性质”的判定⁷，从而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⁸

从政治的角度看，“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反映了现代中国重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历史叙事的努力；而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两项工作则推动了将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民族理论“本土化”的系统尝试。

¹ 本文刊载于张静主编，2019年，《中国社会学四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20-240页。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³ 在学术史上，这三个学科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关联，直到今天亦难以划清界限。相关问题可参阅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一位人类学家的札记与评论》，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⁴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收入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⁵ 尽管“民族识别”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经展开，并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56个民族”的名单直到1979年基诺族被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后才正式确定下来。

⁶ 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未识别人口为79.9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08%。

⁷ “社会性质”即各民族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⁸ 可参阅李绍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二）》，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总第221期）。

具体而言，“民族识别”工作所涉及的正是民族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何认定一个“民族”及其边界？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但事实上，由于“民族”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生成的社会现象，因此，判定“民族”的标准及其边界的划定总是与该“民族”形成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而言，“民族识别”所面临的最大的理论挑战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中包含的四条“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判别标准，中国尚有若干“非汉”的社会群体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早期。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标准，这些社会群体只能被称为“氏族”“部落”“部族”等，¹而非更高形式的“民族”。²然而，这样的等级式分类不但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相冲突，³不利于在新形势下增强边疆“非汉”人群对新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与“民族”一词进入中文语境后的实际用法不相符合。⁴因此，“民族识别”的核心就是要发展出一套“本土化”的民族识别标准，能够将中国那些在人口规模、文化发展程度、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巨大的群体都定义为“民族”，使其在国家的民族制度体系中拥有平等地位。⁵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识别”实际上是以制度的方式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进行了“强制简化”。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常识”的“56个民族”的分类体系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家构建“本土化”民族理论的最重要成果，它为此后四十年的民族研究留下了一份内涵复杂的遗产。一方面，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而成的“五种丛书”达到了8000万字的规模，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的见证；但另一方面，国家的指导性意识形态和“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为这个“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打上了深深的“国家化”烙印，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极强惯性的学科范式，这事实上为此后的民族研究套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研究的理论创新和重要争论都是围绕着对这副“枷锁”的反思乃至反抗而展开的。

二、费孝通的反思：从“藏彝走廊”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

自1978年起，费孝通在多个场合的发言、讲话中，都论及了前一阶段的两项工作。在肯定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绩和意义的同时，他着重指出了“民族识别”的若干遗留问题，包括“未识别民族”的问题、“平武藏人”是否是藏族的问题、壮族与布依族是否是两个单独民族的问题、彝族与其他彝语支民族是否是不同民族的问题等。⁶在论及这些问题时，费孝通关注的重点并非这些民族是否“划错了”，而是之前的民族研究所存在的重要的方

¹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1978年9月）、《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均收入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

² 事实上，前苏联的“民族识别”即是采取了这种等级式的分类方式，包含有部落（племя/tribe）、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narodnost）、民族（нация/nation）等多个层次，而只有那些人口在10万人以上、具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族体，才被成为“民族”（нация/nation）。相关内容可参阅何俊芳、王浩宇：《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

³ 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⁴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⁵ 关于“民族识别”的具体内容，可参阅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

⁶ 相关内容可参阅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1978年9月）》、《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均收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方法论缺陷。

这个缺陷的核心就是“一个一个民族进行调查研究”¹的学科范式。费孝通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产生上述遗留问题的地区在历史上复杂的人群流动与民族交融，并认为这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²恰恰反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独特性，而“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进行的民族研究是无法洞悉这种独特性的：

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³

针对这个问题，费孝通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并将“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⁴“藏彝走廊”的概念就是在这一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下提出的：

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有如孤岛般存在着的，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种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解放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戎语。从这里向西，越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语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河和其间的山脉就是居住着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傣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象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⁵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见，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与“分族写志”的传统相对立的新的研究范式。除“藏彝走廊”外，费孝通又相继提出了“南岭走廊”、“西北走廊”等概念，主张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区域，以区域为单位进行民族调查，而最终的目标是上升为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的理解。

这一目标凝结为相对完整的理论阐释，即1988年正式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⁶该文依托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描述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从“多元的起源”，到形成“地方性的多元一体”，再到形成“南农”、“北牧”两个“初级统一体”，最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并以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述概括了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历史关联：“你来我去，你去我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民族研究的学科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它提供了一种与“分族写志”的传统相对立的整体性民族研究范式；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述则委婉地表达了对“民族识别”的“强制简化”倾向的批评，隐含了一种将“复杂性”重新带回民族研究

¹ 费孝通：《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

²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³ 费孝通：《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

⁴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1978年9月）、《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1981年12月）、《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1982年4月）、《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均收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⁵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⁶ 该文是费孝通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央民族学院所开设的一门民族史课程的讲稿的基础上、借在香港 Tanner 讲座的机会重新整理后发布的，收入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的努力。

然而，“国家化”的研究传统（依托于在这一传统下建立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群体）具有强大的惯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元一体”的表达方式迅速被吸纳为官方的民族话语，但其理论深意却没有被此后的民族学研究所真正重视和遵循，尤其是其中暗含的对“民族识别”所构建的认知体系的批判，并没有成为引导改革开放后的民族学研究的关键线索。

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扬了费孝通的学术反思，并给民族研究带来新视野的，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二者都遵循了一条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中国田野，并与中国民族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径。

三、“华夏边缘”与“中间圈”：“民族研究”的人类学视野

改革开放后重建的“人类学”没有“民族学”这样的历史包袱，它迅速地开始了将之前三十年“隔绝期”的西方学术进展引入中国田野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当时由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新一代人类学家所从事的本土人类学研究大多将田野地点放在了被西方学者视为代表了“典型中国”的东部汉族社会。¹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出现了所谓的“族裔转向”（ethnic turn）²，中国的人类学者也开始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中国民族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结合起来，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研究“本土化”的重要线索。王明珂关于“华夏边缘”的理论建构³与王铭铭关于“中间圈”的学术构思⁴代表了这条线索上最重要的成果。

台湾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以《华夏边缘》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研究具有明确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其应用的理论框架主要来自两个领域：其一为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核心是“客观特征论”与“主观认同论”这一对经典的对立范式。王明珂将之引入“民族史”研究领域，构造了一对新范式——“溯源研究”与“边缘研究”，并在后者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从“华夏边缘”的形成、扩张和变迁的角度来理解“华夏”乃至“中国”之形成历史的新叙事。其二是社会学关于“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王明珂为历史上“华夏边缘”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路径。

《华夏边缘》及其后续研究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人类学者在进行“民族研究”时一种相当普遍的学术取向——与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传统进行对话的强烈愿望。以《华夏边缘》为例，该研究尽管在序论中以“什么是中国人”作为切入点，但“中国人”这个内涵复杂、外延模糊的群体是被作为一个“族群现象”来讨论的，其核心关旨是为发展一种更具一般性的族群理论提供经验材料，而非对“华夏”或“中国”这个复杂文明体的特殊性的关怀。这一学术取向在王明珂的后续研究——2008年出版的《游牧者的抉择》⁵一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该研究并未将对“羌”的研究纳入或接续到“藏彝走廊”的学术脉络中，而是将历史上的“西羌”作为内亚“游牧社会”的一种形态，与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东北的森林游牧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接续了西方人类学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传统以及海外中国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内亚视角。

¹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第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² Millward, James A., Dunnell, Ruth W., Elliott, Mark C. & Foret, Philippe.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p.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ruzon, 2004

³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⁴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⁵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相对而言，王铭铭的“中间圈”理论则更明确地体现了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继承和构建“本土化”人类学理论的努力。王铭铭明确主张以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来构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他基于“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理想”，将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三圈”——核心圈、中间圈及外圈：

从中国人类学角度看，核心圈就是我们研究的汉族农村和民间文化，这个圈子自古以来就与中央实现了再分配式的交往。……中间圈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地带中的人，居住方式错综复杂，不是单一民族的，因人口流动，自古也与核心圈的东部汉人杂居与交融。……这个圈子与外圈结合着，有时是内外的界线，有时属于外，有时是内外的过渡。……第三圈就是所谓“外国”，可以称这类人类学研究为“中国的海外人类学”。¹

与“藏彝走廊”一样，“中间圈”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关于中国人类学应该具有的“世界观”的整体性学术构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概念试图构建一种关注“中间性”的论述框架。在对中国这样的复杂文明体进行解释时，它强调“关系”、“流动”和“传统区域世界的多层次性”²。这一“关系主义民族学”的理论建构不仅延续了费孝通对“分族写志”传统的反思，而且更进一步地表达了对西方人类学“简单化的‘中心-边缘’二分法”³的批判。

从研究视野的角度看，这一构思提倡一种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理解的问题意识。“中间圈”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与核心圈及外圈的区别，而恰恰在于它与二者的联系。推而言之，“民族研究”的意义也就不止于发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秩序的独特性，而更在于它对于“多层次”的中国文明所具有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间圈”的学术构思与“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找到了汇合点：

将中间圈当成一系列社会来研究，能说明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何以不能不是“多元一体”的。如何使境内的核心圈与中间圈的研究得到并举，同时看到两个地带和元素对于整体中国构成的同等重要的作用，并看到寻找超越于二者的“凝聚力”的历史，是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可以专注回答的问题。⁴

改革开放后的人类学为“民族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和解释范式，极大的提升了“民族研究”的“学术化”程度。这一变迁的动力更多来自学术传统内部的自我反思与创新，尤其是西方学术成果引进后与“本土化”研究间形成的张力，而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似乎关联不大。

四、“新方法”与“新思路”：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化”尝试

与人类学不同，“社会学”介入“民族研究”的契机，与国家“民族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族识别”工作落下帷幕，“少数民族如何现代化”的新问题，构成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重视“现实问题”的“社会学”开始在“民族研究”中获得地位。

在1981年和1982年的两次座谈会上，费孝通明确使用了“民族社会学”这个术语，认为“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这就是民族社会学”；但关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方法等问题，他并未给出系统的阐释，只是通俗地指出：以前的社会调查是“看见什么记什么”，而今后的调查需要“有点计量的，有点比例的，有点数目的，准确一点。……要有一个轻重、多少，

¹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第53-54页。

²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第60页。

³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第70页。

⁴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第69页。

要有一个比例。”¹ 在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初期，有“计量”“比例”“数目”的定量研究方法代表了当时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直观印象。

从这种狭义社会学——现实问题、定量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化”同样是由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新一代社会学家推动的，因此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将西方的研究范式应用于中国田野的路径。

1987年，马戎在美国布朗大学完成了关于中国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的博士学位论文。² 这是中国民族研究的历史上首次以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以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民族关系”为主题进行的民族研究。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社会学的“民族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类似的思路和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8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从事的西藏调查³和2000年前后在几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呼和浩特、银川、南宁、乌鲁木齐、昆明、西宁）进行的民族居住格局的调查。⁴

定量调查方法——尤其是“族群分层”“居住格局”等测量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的量化指标——的引入，开辟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路径，既突破了“民族志”的传统范式，提升了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化”的程度，也提供了在宏观层面探讨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结构性特征的可能性。直至今日，关于族群分层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当代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⁵

然而，这种以“新方法”来推动的“社会学化”的努力亦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核心即在于“问题意识”的缺失。量化的测量指标直接借用自美国的族群研究成果，但美国以“种族”为基础、以移民国家和城市社区为场景的族群结构与中国的民族构成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这些量化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性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量化研究带有“去历史化”的倾向，隐含地建立在民族身份的“本质性”假设之上，即将“56个民族”默认为固定的、边界清晰的人群分类。在这个意义上，这其实偏离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体系所确立的问题意识。

新世纪伊始，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论战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带来了国内民族格局、民族关系的新变化：首先，人口大规模流动使传统的民族聚居区形态发生了变化，“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受到了挑战；其次，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以行政手段平衡民族利益、协调民族关系的能力下降，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拉大；再次，民众对“民族平等”理念之内涵的理解日益多元化，民族优惠政策的合理性开始遭到质疑。这些情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建立在“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族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去政治化”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2004年，马戎发表长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⁶。该文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的思路区分为两类——“文化化”与“政治化”：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在如何引导族群关系方面大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

¹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1982年5月），收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² Ma, Rong. *Migrant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Rural Chifeng,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1987. 值得说明的是，以赤峰地区作为博士论文的田野地点，正是来自费孝通的建议，费孝通于1984年8-9月在该地区进行了近20天的实地调查，并撰写了《边区开发四题——赤峰篇》。

³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

⁴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0-421页。

⁵ 代表性研究如吴晓刚、宋曦：《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分层：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证研究》，在《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马忠才：《中国新疆的社会结构：族群分层与流动机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⁶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截止2018年8月，该文的引用频次已达536次，堪称新世纪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作。

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¹

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古今中外的多民族政治体都可以被置于这一分类框架中予以分析，并由此解释这些政治体内部民族关系的演变机制。其中，中国传统王朝时期的民族观和相应制度与美国当前的少数族群政策被划为“文化化”的类别，而欧洲近代的民族主义浪潮、前苏联的民族联邦制，以及——最重要的——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制度与政策——被划为“政治化”的类别。

马戎的论据主要基于三点：一、“民族识别”将原本边界模糊的“族群”由官方确认为边界清晰的“民族”，并将个体的民族身份固定化；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民族”与地域正式挂钩，使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力和“自治地方”；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以“群体优惠”的形式赋予少数民族以超越个体性的公民权的特殊权利，并将少数民族身份与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资源获取联系起来。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最终落脚于明确的政策指向。这里所谓的“去政治化”，即指消除中国少数民族身份的政治意涵，而仅保留其文化意涵，具体体现为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将中国的“56个民族”改称为“56个族群”，对应于西文中的“ethnic group”的概念，以区别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在实现民族平等方面，以保障公民的“个体权利”取代民族的“集体权利”；在优惠政策方面，逐渐以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优惠”取代针对少数民族全体的“民族优惠”。

“去政治化”的主张对新中国成立后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民族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在民族研究领域引发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提出了反驳和批判意见。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政治化”与“文化化”的类型学框架的质疑。多位学者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同时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等多维属性；² 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³ 无论是将民族问题“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都是国家支配的“政治行为”。⁴ 因此，在逻辑上，以“政治化”和“文化化”来区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制度思路，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上，“去政治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郝时远指出，事实上，“政治化”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的主流选择，国际社会在处理基于种族、民族、宗教、领土、语言等引发的冲突和战争时，都以“政治解决”作为化解冲突的规范。⁵

其二是对作为论据的“国际经验”的有效性的质疑。首先，多位学者否认了美国的种族、族群政策可以被定义为“文化化”。郝时远指出，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种族、族裔因素始终是讳莫如深却又不能回避的问题；⁶ 同时，美国尽管没有中国式的“民族识别”，但同样存在官方的种族、族群分类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实施具有“优惠”、“照顾”特点的“肯定性行动”。⁷ 其次，多位学者认为，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民族联邦制这种“政治化”的制度安排；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一能够实现民族平等的制度，在实践中没有真正有效地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鼓励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才导致了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离德。⁸ 因此，无论是作为“经验”的美国，还是作为“教训”的前苏联，实际上都不能支撑“去政治化”的理论主张。

在以上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上，反对“去政治化”主张的学者们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

¹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² 金炳镐、孙军、肖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3期。

³ 都永浩：《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评民族“去政治化”与“文化化”》，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3期。

⁴ 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

⁵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⁶ 郝时远：《美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榜样吗？——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2期。

⁷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

⁸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

中国国情，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中发挥了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互助、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作用；¹ 因此，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族际政治安排、完善和发展民族优惠政策，才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良方。²

这场关于中国民族制度的整体思路的大辩论，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当的热度，影响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其他领域。除“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外，大量公共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并将“少数民族‘去政治化’”的议题与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总体讨论联系在一起。³ 从结果来看，这场辩论尽管不可能盖棺定论地得出“对”与“错”的结论，但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民族研究领域长久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学带给民族研究的最大贡献。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辩论尽管热烈，但由于与国家的制度、政策的联系过于紧密，其整体的学术性并不高。与“去政治化”这个概念的字面意义相反，正反双方的立场与关怀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辩论延续了建国初期的民族研究的“国家化”取向，它毫不隐晦地服务于为国家的“民族工作”提供智力支持的应用性目标。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无论是“去政治化”的理论框架，还是反对这一主张的理论阐释，都没能与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也就缺乏在理论上继续推进的动力。

五、“何为中国？”——历史维度的新拓展

“历史学派”是近代中国“民族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民国时期即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体系中完成了大量关于中华民族及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起源和演变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学科调整中，“民族学”被定义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民族研究”大体上成为了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的综合体，其历史化倾向更为明显。⁴ 费孝通于 1988 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总体上也是一个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给民族研究带来新视野的并非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而是若干受到社会科学理论影响的新兴历史研究范式逐渐与“民族研究”产生的交集。

这类历史研究的学术脉络颇为多元。首先是“区域社会史”的脉络，这大体上可以视为“华南学派”的研究传统在地理范围上向西南地区的扩展。⁵ 根源于“本土”的“区域社会史”视角正是费孝通所寄予希望的民族研究方法——在长程历史中观察一个较大区域的社会变迁和民族互动。它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关于明清乃至宋元以降的西南地区的政治变迁、人群流动和文化交融历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多元一体”格局的细化和深化；尤其对费孝通关于“汉族”作为凝聚多民族中国之枢纽角色的论述，提供了经验支持。但从另一方面看，“区域社会史”视角的民族研究成果大都局限在中国南方地区（以西南为主），这些地区大体上属于中原的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可以有效推进的范围，因此也是“汉化”模式可以解释的范围。而对于在区域历史、民族结构等方面情形迥异的西北、正北、青藏高原等被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称为“内亚”的区域，这个研究视角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解释框架。

“内亚史”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清史”的研究）则代表了另一条学术脉络。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内亚史”秉持“边疆中心观”的视角，强调“内亚”传统的连续性和相对于“中国”的独特性。它特别关注历史上由内亚游牧人群所建立的政权或王朝，主张从这些政权的内部

¹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

²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载《世界民族》，2005 年第 5 期。

³ Leibold, James. *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 *Policy Studies*, Vol. 68, The East-West Center, 2013.

⁴ 王建民：《从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⁵ 代表成果如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

视角来理解其历史进程及其与“中原”的关系。

如果说前述“区域社会史”的理论关怀在于探寻“多元一体”的形成机制，那么，主要由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推动的“内亚史”研究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致力于解构这一叙事。这种带有明显后现代史学倾向的“内亚史”研究，不仅对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对整体的中国史叙事提出了挑战，因此引发了中国历史学家（并不局限在民族史学家）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思考与辩论。¹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解构中国”的危机，反倒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推动了打破将“民族研究”狭义地定义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的局限，边疆、民族议题日益被视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明体系的重要维度。

这样一种新视野的开拓，集中地体现在关于“何为中国”的讨论中。在这个主题下，“帝国”“民族”“民族—国家”等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生成的社会科学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适用性问题，获得了富有批判性的讨论；同时，中国的“本土概念”——如“天下”“华夏”“蛮夷”等——则被置于新的研究视野下予以理解，以探寻突破“民族—国家”的认知模式、“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²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来看，这个方兴未艾的主题构成了“民族研究”领域最值得期待的理论机遇。

六、结语

对“多民族中国”之可能形态的探索，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研究，依托于“民族识别”的工作，绘制了一幅整齐划一的民族地图，同时也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来划定边界的研究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民族研究的推进，正体现在打破上述两种桎梏的努力上：一是要打破这幅地图所形成的简化且僵化的认知模式，将复杂性带回民族研究；二是要打破不合理的“学科分工”，从而使“民族问题”能够在关于“中国”的整体性问题的讨论中呈现意义。

在历史取向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努力所取得的进展，历史上复杂的人群流动和边疆形态演变，构成了历史学家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复杂文明体的重要维度。然而，遗憾的是，在更关注现实问题的社会学领域，类似的成就还尚未显现。社会学家的田野很少会拓展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即使偶有社会学家将在汉族社会的研究中形成的理论洞见置于少数民族社会中予以验证，其关怀也往往是该理论的适用性，而非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包含其与汉族社会及国家的关系）的整体性问题予以关照，更非对“多民族中国”之可能形态的探究。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学所完成的“本土化”，只是“汉族社会化”或“内地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如何将“民族议题”包含进社会学对中国整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重要但远未解决的难题。

¹ 由多位学者的相关文章组成的文集《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是最近一部显示了这个议题所具有的广泛吸引力的作品。

²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论 文】

明清以降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方式研究¹

杜树海²

摘要：从中国南部边疆研究的个案经验与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出发，可以总结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的五种方式，即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与信仰仪式统合。具体而言，边地人群通过族谱书写、口传故事等形成了王朝国家内部地缘与血缘一统性的想象；文化地景塑造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态度与情感，还凝聚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众的国家认同；礼法话语建构揭示出边地上层对于“大一统”礼法制度的学习与实践；资源/人员流动说明了王朝国家后期日益频繁的物资、人员与信息流动对于国家整合的促进；信仰仪式统合则显示了“大一统”文化元素在地方文化层级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国家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地方文化具有了层次性。

关键词：南部边疆；国家整合；多层一统；地方传统。

一、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

笔者的博士论文曾以中越边境广西区域为研究地域，总结出当地的国家整合进程。北宋广西左、右江上游区域侬智高起事的失败，象征着在两个王朝国家的中间地带已经不存在建立与维护一个新王权的空间。宋末至明初，曾在中原王朝与安南王朝之间“两边倒”的地方势力有的被彻底消灭，有的则转而投入中原王朝的怀抱，并将祖先追溯至中原地区。明初在思明府（府治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土司与安南王朝进行土地争夺的过程中，中央王朝的力量被引进、借重，土司势力范围逐渐成为国家边界。明王朝制定的礼法——有关土官承袭的规则与程序——成为土司与王朝“交流”“沟通”的语言。一方面，王朝国家相当重视并努力控制土司权力传承的谱系；另一方面，土司内部势力则用伪造谱系的方法实现自身的利益。

明后期，土司统治内部流官权力凸显，思明府出现“一府两制”“流土分治”的局面。到了清初，左、右江上游地区成为国家资源运输与人员流动的重要节点，鄂尔泰的军事镇压政策则奠定了广西土司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基础。

改土归流后，外来官员与科举功名体系推开后培养出的地方功名人士，联手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文化面貌：归顺州（州治今广西百色市靖西市）的地方历史被建构为南宋义士所开创，“祖源广东南海”说成为普通大众遵循的模本。直到今日，我们仍能实地观察到不同文化传统与礼仪的叠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层级与体系。如果说麽婆吟唱、土地公献祭等是比较古老的传统，那么扶乩等则是清代文教推开后产生的新传统。多样的传统在当地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并存，它们形成的是一个融合的层级与体系，而那些与王朝国家“大一统”相关的传统占据着这个层级与体系的优势位置^[1]。

那么，经由上述历史过程可以总结、提炼出什么样的概念、范畴，以供其他地域与学科的研究参考、借鉴呢？就此，本文尝试提出数种国家整合方式，以期建立一种量度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程度的指标体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整合”的概念，在本文中它指国家力量在各个地域建立、深化以及均质化，各个地域整合进国家范围以及一体化的过程。此一概念受到内特尔（Nettl）提出的“国家性”（stateness）的启发，内氏认为应该将国家视为一个概念性变量而非非常量——不同国家间存在质和量的区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实证的比较研究

¹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春季刊。

²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2]。内特尔遵循的是比较政治学的路线，论证的是世界各地、各国家之间存在的“国家性”差别，而本文认为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域亦存在此种差别，国家整合的过程就是“国家性”均质化、一体化的过程。

论及国家整合，科大卫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虽然重点在于解释地方，但是已经明白透露出国家的建构、整合属性，他曾写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循这一方面来走，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3]温春来揭示的黔西北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进程则为“国家整合”概念提供了精彩案例[4]。就中越边境广西区域而言，部分学者的研究已经触及国家整合问题，蒋俊研究了历史上壮族土司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罗彩娟对当下边境地区壮族的国家认同进行了人类学研究[5]。前述研究或专注某一地域、某一具体方式，或无意定义、区分各种不同的国家整合方式，这正是本文的必要性之所在。

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曾经提出“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上对民族主义的归纳多数只关注其暴力和血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其日常化的、平和的一面，因此，他用“日常民族主义”一词来指称那些通常没有被注意到的、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实践。他形象地指出：“日常民族主义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和激情下被有意识地挥舞的旗帜，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6]本文认为比利格对民族主义研究旧有传统的批判以及对新选路径的倡导，同样适用于有关国家以及国家整合的研究。

依据我们的传统研究，国家整合理应包括政制建置、军事部署、经济融合以及文教推广等方面，这方面较新近的研究是苏力关于“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的研究[7]。本文想要指出，这种研究更多地从王朝国家的视角出发，关注的重心是军事行动、典章制度、政策措施等的推行，基层百姓的感受与反应不过是论证典章制度等执行效果的证据；而此处的研究坚持从当地人群出发，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心理认同，王朝国家的典章制度等则为这些实践活动提供了创作框架和表演舞台。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本文坚持的路线之一。刘志伟曾作出精辟概括：“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指汉化模式——笔者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8]

因此，本文强调的是以下五种国家整合方式：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以及信仰仪式统合。虽然上述国家整合方式总结、提炼于中越边境广西区域，但是它们对于中国南方边疆地区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例如，陈贤波就研究了清代贵州都柳江流域土司祖先故事的创作，黄菲研究了清代云南东川府的地景塑造与王朝国家及当地土著的关系[9]。笔者更希望这样的经验总结突破地域模式的层面，希望这五种方式能够构成一种指标体系，用来量度明清时期整个王朝国家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也供其他地域研究结果的检验、修正与校准。总之，明清时期是中国国家疆域底定的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的国家整合意义重大。

二、五种国家整合方式

（一）地缘血缘想象

“地缘血缘想象”作为一种国家整合方式，指明清时代边缘地区的人群通过墓碑族谱、口传故事等机制，建立起对王朝国家内部地缘、血缘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认知与想象。

就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的想象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作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民族）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0]回到历史上的明清时代，边缘地区的人群是如何形成他们对（王朝）国家的感知和认同的呢？本文认为，他们一方面需要知晓自己身在何处，另一方面需要明白这个国家还有哪些其他地域。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了解自身地域与其他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视角出发，历明至清广西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出现的祖源山东青州说、自广东南海迁徙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重大。

在明代成化年间所制的石刻文字中，广西恩城赵氏土司（州治今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便把自身祖源追溯至跟随狄青南征侬智高的宋代将领，并视山东青州为祖籍地：“赵仁寿，本贯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氏，跟随总兵官狄青来征邕州南蛮侬智高，获功绩，得地方水土，一并归附。祖赵仁寿特令恩城州世袭土官知州职事，子孙相继，承授祖业，传之后嗣，耿耿不泯。故此刻石以为之记。……时成化八年岁次壬辰三月三十日，致仕知州赵福惠立。”^[11]

清代乾隆年间广西归顺州的功名人士覃恩祚在为其祖父树立的墓碑中，讲述了从广东南海迁徙的故事：“始祖印峰肇自广东南海，归马平乐，后移归顺州乐业。”¹尽管在明代覃印峰本人的墓碑上并无丝毫相关的记载，但时至今日，靖西市的绝大多数姓氏均声称自身来自广东南海。

明代发端的山东青州说集中在土司或头目家族中，清代兴起的广东南海说则遍布普通民众之家。尽管这些说法明显缺乏史料支持，有的甚至已为学者所辨伪，严肃的学者多用其测度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但这些传说依然意义重大。它们不仅使得边缘人群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是谁，还为边缘人群指示了前进的路向——他们应该和谁在一起。正因为这些故事恰好又都是祖源叙事，所以它们又为地缘上的想象打上血缘的烙印。附着于血缘的情感纽带最为朴素、纯真，人们对它的依恋度和忠诚度也最高。

这类祖源叙事在有的人看来是真实的历史，在部分学者看来不过是自卑者的攀附，但在笔者看来它们既是特殊地域国家整合的方式，也是国家整合的结果，体现了地域人群身份与认同的建立。当然这种身份与认同并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生活的东西，它们永远和人们的生存境遇相配合，渗透着人们的生存智慧与生存策略。

明初，思明府土司为请求官员解缙为其父撰写神道碑而“流涕而跪”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思明黄氏土司一家虽早早归顺明王朝，但仍被明太祖斥为“蛮夷”。当时黄氏土司与安南王朝有地界之争，他急于借助明王朝的力量向安南施压。于是乎，黄氏便主动从身份与认同上拉近与王朝国家的距离，叙述黄氏祖源在中原的神道碑也就应运而生。解缙的碑文叙述黄氏故国在湖广黄州，曾“尊周室，后并于楚”，又说思明黄氏曾被狄青奏补成忠郎。这样的叙事显然能够帮助黄氏去掉“蛮夷”的身份：黄氏的根在中原，祖先曾被中原王朝授予官职。碑文中着重叙述了思明黄氏从宋至元的历史，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其统治这块土地的合法性。正如广成所言：“余家守此将三百年，而当两世革命之际，前有训武公，后有朝列公，实宠绥之。不有彰微，其何以示子孙，俾思明之人有所考见哉？”碑文所载元代镇南王出征安南，思明黄氏祖先予以协助的历史也被用来作为要求归还“侵地”的证据^[12]。

在一个时段内，我们曾以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等象征来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如果对这种认同模式追根溯源的话，它的凭借与根基或许就在于历史上那些尚为复数、尚未归一的祖源叙事。

（二）文化地景塑造

¹ 这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采录的碑文。

“文化地景塑造”是指明清时代的边地人群与地方官员合谋营造本地客观或虚拟的地理景观，将国家意识形态与自身的国家认同、群体情感“物象化”“定型化”，并长久传承的过程。

“地景”（landscape），比较经典的定义是：“我们显然无法只把地景当成物质特性。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文本’予以解读，并且告诉居民和我们自己有关人群的故事——涉及他们的信仰与认同。这些并非永远不变，或是难以形容；有些部分是日常生活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有些则可能引起政治争端。”^[13]从客体对象上看，地景既包括自然景观，又包括人为活动形成的社会人文景观。不仅如此，地景还蕴含人类对景观的阐释，诸如神话、传说、故事等等；地景还附着人们的审美态度、情感认同以及意识形态。长江、黄河从水文数据上看，跟地球上其他河流相比，或许并无特异之处，但它们被赋予“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称谓，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方志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朝廷官员与地方人士寻找象征中国南方边界的铜柱，此时出现钦州（州治今广西钦州市市区）地名“分茅岭”：“分茅岭，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古森洞与交界。山顶茅草南北异向。昔传马援平交趾于岭下，立铜柱以表汉界。崇祯九年张国经访铜柱远近，得贴浪老叟黄朝会云，万历间会至其地，见茅草分垂两边，岭去铜柱尚远。”^[14]此地名或因中越边境地区某处山岭草木异形——山顶茅草南北分垂——而出现，但它被认定为明王朝与安南的分界标志，颇具中国历史上天人感应思想的意味。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法战争后，两国官员勘分清、越边界，分茅岭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分界依据。

乾隆年间广西镇安府（府治今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属龙神庙的兴建，不仅在原有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增添了人文景观，关键是还引进了“大一统”的神灵，并对地方原有神灵形成一种凌驾之势。建庙碑文记载，这位神灵的进入还与遥远的皇帝旨意有关：“我世宗宪皇帝念切民依，如伤在抱，虑四方旱涝之不济，爰于雍正八年敕封龙神分主各省，令天下俱立庙虔祀。其为四海苍生计，至周且渥矣。”^[15]即朝廷于雍正八年有敕封各省龙神分主，全天下俱立庙祭祀的旨意。由此可见，乾隆年间镇安府修建龙神庙不过是王朝政治运作的一个环节，亦可见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在做着同样一种事，即利用祭祀、信仰等来实现王朝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一统性。

同治年间归顺州的功名人士通过树立张天宗塑像，修建张天宗墓园，将本地宋代土著溪峒首领改头换面，打造成为曾随文天祥抗元的南宋义士。明代本地岑姓土司，亦即宋代张姓首领的征服者、后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前代真实的历史，他们更愿意将张姓首领放入神的范畴，借以削弱其世俗影响力；而清代的功名人士则重新把神还原为人，不过此人已非彼人，土著首领变为更加符合功名人士理想的南宋义士。同一段历史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境遇，不同历史主体对它的重新阐释和改写，蕴含着各个历史场域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竞争。清朝中后期，归顺州一地的意识形态就是消除土司的遗留影响，建立王朝国家的正统性^[16]。总之，因张天宗墓园的修建、塑像的树立，本地的“蛮夷之气”一洗而尽，地方士气为之鼓舞。这种情感充分体现在民国时期靖西中学的校歌歌词里面：“边疆幅员千万里曾经谁开辟？昔年张天宗；云山鹤泉峰峦地期待谁整理？今日我靖中。”

其实，地景有时还可以完全脱离客观对象的限制，本文尝试谓之为“虚拟地景”，即不存在客观对象物的地景。如前文已述的铜柱，传说其为东汉时马援将军征讨交趾二征起事时所立。6世纪成书的《水经注》引《临邑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17]于是铜柱成为中国南方边界的最重要标志物。到了明初，安南方面就明言“千载之下，陵谷迁变，谁复能辨”^[18]，但是有没有真实的铜柱已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坚信有一处马援所树、象征分界的铜柱存在。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广西东兴市口岸附近采访时，仍有当地老者声称其小时候曾在口岸对面的越南境内看见过铜柱。按其说法，铜柱如碗口粗。

明清时期诸多广西或外来的文人墨客均写有凭吊马援的诗歌，其中铜柱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象征物，现试举一例：“南天自古限江河，犹记当年马伏波。铜柱曾经标粤界，鐔津永不混蛮歌。”

[19] 这首诗为清代广西中部一个县的地方文人所写，“潭津”即是他所在地的名称。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马援所立铜柱划清了广西与越南的边界，才使得他的家乡永远脱离“蛮歌”地带。寻找与制造一种边界，将“外部人”限制在外部，将“自己人”圈定在内部，这就是内部整合的重要手段。总之，边缘地区地景的塑造既渗透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又凝聚着地方人群的情感认同，是国家整合的重要方式。

（三）礼法话语建构

“礼法话语建构”指在明代朝廷推行有关土司承袭制度的背景之下，边地上层人群在不断争论、挪用国家制度的同时，逐渐习得象征王朝国家“大一统”的家族制度以及儒家理念。

理解中国的国家整合，自然离不开对中国制度文明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制度显然再也不能沿用“死”制度的老观点——仅仅关注制度条文、制度框架等等，以为这些制度曾经被切切实实、不走样地执行过；我们需要的是“活”的制度史研究：制度如何被制定？制度如何被执行和利用，以实现不同个人、群体的目的和利益？亦即制度如何成为一个对话过程。

明朝廷于洪武年间出台有关土司承袭的制度：“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

[20] 这项制度影响深远，一方面，它直接促进了土司的家族化以及土司家谱书写传统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一种囊括各方的礼法话语的形成。回到历史情境之中，我们发现土司承袭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它不但是对原有地方传统的承认与妥协，还充满争议空间。王朝、官员更多时候都是“选择性执法”，借着这套制度打击那些叛乱无常的土酋，拉拢那些可供驱使的土酋。例如，嘉靖年间广西龙州土司（州治今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官族赵楷被朝廷认定具有戕害侄子、篡夺土司职位的罪行，但朝廷官员在处置他时，仍许诺由其子承袭土司之职，条件是他要保持地方的稳定。史载：“（翁）万达召楷及邓瑀等入见，伏壮士劫之，曰：汝辈滔天罪，不得活，命尽今日矣，宜自为计。楷死，官必及汝子，可为书谕汝党，勿乱也。”[21]

面对王朝国家在土司职位袭替过程中的系谱控制，土司内部各种势力却也知晓如何利用这套制度，制造谱系、冒充朝命的事例举不胜举。嘉靖时，思明府土官黄朝就曾伙同头目，声称自己与情妇之子乃邻境凭祥土州（今广西凭祥市）土官之孙而争袭：“（苏寄枝、李满）阴比黄朝，朝有外妇子时芳，长矣，诡云广宁孙也，父璉争立时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纳时芳凭祥，弗克。”[22] 又如，在前述龙州土司职位的争夺战中，便有一帮头目支持一位 13 岁的小孩出任新的土司。他们的理由是，老土司天生异相，长有六个手指头，现在他们支持的小土司也是六个手指头，所以是“货真价实”的[23]。总之，在这些林林总总传奇故事般的叙述中，各种说法的真实性实难确定，这反映了各种势力出于各自利益，对不同袭替人选正统性的宣称与争论，也反映出当时依靠家族系谱作土官职位袭替的实践遇到很多问题，假冒、替换等现象还很常见。文字的系谱始终停留在纸面之上，在那个时代对应袭之人“验明正身”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以手指个数来证明身份的故事。

尽管明代的土司承袭制度漏洞繁多，执行起来更是多有偏颇，但是王朝官员、土司势力均非常重视并十分熟悉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就是他们共享的论证合法性的理据，他们在相互争论、博弈之时需要不断援引。这就构成了一种话语平台，各方均能利用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又将各方整合到一起。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整合作用，我们可将其放置于历史比较的视角之下。宋元时期，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地方土酋与中央王朝大致保持一种“进贡-授官”的互动关系，王朝国家对于地方权力的传承等等土酋内部的事务并不关心。进入明初，正是这套承袭制度的出现，为各方提供了一个参与平台，各方均能据此进行争论、博弈，地方土司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实践“大一统”的家族理念。我们知道，进入清代，南方地区的绝大多数土司都被改土归流，即便那些留存至清末民初的土司，其统治、治理功能也被逐渐剥离，土司制度的转化方向和承接载体正是由汉

人地区移植而来的家族制度。亦即，土司被改土归流或其政治功能被剥离后，通常以“家族”形式长期存在。

总体而言，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地方土司受到的王朝国家的军事、政治压力并不算大。广西边境地区的卫所军人大多被用来修筑流府城墙，或被用于刺探情报；土司地区的钱粮税赋也是“俾其认纳，永不加增”。王朝国家并不想，当然也缺乏足够的力量大规模建立直接统治。

最后，让我们用一种“牌局理论”来形象地说明前述的整合作用。坐在牌桌前的人往往类型复杂，有的老老实实按规则出牌，有的时时处处想着出千作弊，有的则不断挑战牌局规则，要求修改规则等等。但是，牌桌上的人终究相信有一套规则的存在，正是关于这套规则的争论、博弈与妥协将他们结成一个“局”，而不是其他，那些远远坐着的旁观者与他们显然不构成一个“局”。总之，让一群互不熟悉的人学习一套规则，这套规则最好有些弹性与漏洞，以使他们相互争论、博弈，这就是一种把人们整合成一个团体的好办法。

（四）资源/人员流动

“资源/人员流动”指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乾隆以降，王朝国家内部物资、人员与信息的流动呈现大规模、高强度的趋势，这促进了各地域（特别是边缘地区）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进程。

对于边疆地区而言，地方物产成为国家资源即象征着地方的被整合。有鉴于此，斯科特曾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一个前现代东南亚大陆上的统治者对我们今天称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对或可称为国家可用生产（state-accessible product）的东西更感兴趣。……国家可用生产必须容易辨识、监控和计量，即容易评估。国家可用生产还必须在地理上足够近便。”^[24]这个比喻其实可以延伸理解：国家由于动员能力、技术水平等的提升，正不断把各地物产（可类比斯科特所说的 GDP）转化为国家资源（可类比斯科特所说的 SAP）。近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专著，冠名为“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25]，书中重点叙述了国家需求、国家管制与矿业开发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矿产需求包括币材需求、军备需求等等。其实当时此区域内矿业的开发甚至跟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关系密切。清初铜矿的需求一直依赖从日本进口解决，康熙年间日本减少铜矿出口，这也迫使朝廷全力推进滇铜开采。地方物产被开发利用，成为国家资源，无疑标志着地域的国家整合取得巨大成功。

资源在被开采后必然进入运输环节，由运输线路构成的运输网络则将更大的地域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清代乾隆以后，由云南至广西右江水道的线路成为滇铜外运的主要渠道，这条运输通道由右江至西江后，一路往北经灵渠入长江水系，一路往东经珠江水系入广东、江西。史载：“各省局赴云南买铜者，各厂铜自寻甸店、省店运至竹园村，由竹园村至剥隘。金钗厂铜，自蒙自县运至剥隘，再由剥隘经百色、宝广径达粤江，余局由陡河达湘江。”^[26]

物资流动必然伴随人员的流动，乾隆以后人口从聚集地区向边缘地区流动成为一个全国现象。就广西中越边境地区而言，乾隆时期的地方志即记载广西人常常借口外出贸易，赴中越边境地带挖矿谋利：“广西道通交趾，闻该地方常有无知愚民，希图意外之利，抛弃家业，潜往交趾地方开矿。其所去之人有资本用尽乞食而回者，有侥幸获利而回者，有一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虽禁谕稽查，伊等总以出外贸易为词。”^[27]其实，不只粤西之人前往开矿，其他各省民人亦蜂拥而至，“即云南、广东、福建、江西、湖广等省民人往交贸易及开挖矿厂者，亦不可胜数”^[28]。中越边境沿海地带的情况完全类似，民国《钦县志》载：“乾嘉以后，外籍迁钦，五倍土著。”^[29]

麦哲维（Steven B. Miles）研究了清代横跨广西、广东的西江水域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广东移民进入广西），包括官员、士子的流动，商业移民以及商业网络的建构等等。最有趣的是，他还考察了在珠江三角洲与广西边疆族群地区形成的离散家庭——来回移动的广东男子在两头娶妻生子，形成家庭。广东男子甚至把广西的土著妇女带回广东地区，西江上游的亲戚也参与下

游的宗族建设。在麦哲维看来，西江上游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很大程度上是广东移民在流域上下游间环流的结果^[30]。

人员流动又带来信息的交流。乾隆年间，广西、云南、贵州及广东四省几乎同时发生“挖窖案”。官方档案载：“（乾隆八年）正月内有匪类黄三等五人，在州¹属岜赖寨卢全家中安歇。黄三等自称我会做巫公并访问古硐银厂，我有符章粘在硐门，就可收得，若有银两分与你们大家去用，有军器宝贝要擎去送新王，后来都有好处等语。生等见其妖言惑众，干系地方，当即设法于二月初七日将黄三等四名擒获。”^[31]黄三自称会做巫公²，能够访问古硐³、银厂，会使符章获取银两、宝贝，并有“军器送新王”等语，所以当地监生、头目以匪类的名义将其抓获。在结案之时，时任广西巡抚的杨锡绂上疏总结“挖窖案”的大致情形：“一种挖窖取银之说，不知始自何时，创自何人，居然有书有图，抄写流传。其黠者明知子虚而故奉为神奇，其蠢者相随附和而暗堕其术中。”^[32]四省人受到相似邪术——通过书符可以挖窖取银——的蛊惑，足见当时信息交流速度之快与范围之大。

总之，无论是物资流动、人员流动，还是信息流动，都是国家内部整合的重要方式。这相对于那些曾被视为“异域”“绝域”的边缘之区来说，则更显出特别意义。试想：一群与世隔绝的人如何能够感知他们所在的王朝国家？又如何能够形成更高层次的身份与认同？

（五）信仰仪式统合

“信仰仪式统合”指不同文化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层叠堆积形成了一地的地方文化，而在地方文化的层级与体系里面，象征王朝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元素起着统合作用，从而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服膺。

在边缘地方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里文化传统层次分明、清晰可见，原因在于文化（政治）中心或者其附近地带，文化传统覆盖频率高且覆盖彻底，而在边缘地带文化传统覆盖频率低且覆盖不彻底。在传统时期更是如此，正如俗语所谓的“天高皇帝远”“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广西边疆地区，文化传统的分层特点十分明显，可举出诸多例证。例如，当地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命名（称呼）系统，一种是村落内部的壮语式土名，一种是标准化的汉字姓名。在靖西市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张天宗故事，一种版本里张天宗更像本地的土地神，另一版本里张天宗则是南宋义士。

当然，这种现象特别体现在民间信仰与仪式上面。在以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地区、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深入挖掘，而对一些具有跨区域特征的文化事项却缺乏关注。以广西左、右江地区的民间信仰与仪式研究为例，目前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麽公”与“麽婆”⁴ [33]

¹ 指贵州永丰州，今即与广西接壤的黔西南州贞丰县。

² 在今日之百色市民间仍有“巫公”，又写作“麽公”，“麽”当地读作“mo”。

³ 硐指藏有矿产的山洞。

⁴ 麽公，又称“布麽”，为当地男性仪式专家。关于布麽详见黄桂秋《壮族麽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黄先生认为广西西部左、右江流域及红水河流域存在麽教。“麽教是壮族社会历史上特有的民族民间宗教”，“麽教树立有统一的最高神祇：布洛陀和麽淥甲”。“麽教有自己的基本教义和教规”，“麽教传承有较系统的经典：司麽”。“麽教已形成较固定的法事仪式：古麽”。“麽教有半职业的从教者：布麽”。见该书第12页至第20页。黄先生田野经验丰富，搜集的资料十分充足，但该书中的论述很可能掉进了西方宗教概念的陷阱，结果使得“麽教”被建构出来，影响到我们对社会实态的认识。不过，在以右江河谷为中心的区域发现大量的布麽经书，这确实引人瞩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的“前言”称，该丛书是整理者将在广西右江流域、红水河中上游以及云南文山州壮族地区搜集到的39本麽教经书精选汇集而成。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壮族麽经在流传的过程中亦吸取了道、佛、儒的一些观念，但从总体和本质上看，麽经可视为壮族原生态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一项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麽婆，又有其他学者译作“魔婆”，当地女性仪式专家。“麽”在当地话中有两种意思，一是蚂蚁，二是低声念诵。关于麽婆的研究有高雅宁《广西靖西县壮人农村社会中（魔婆）的养成过程与仪式表演》，台北的唐山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借助对魔婆养成过程的描述，呈现魔婆具有力量的基础；通过对仪式过程的

上面，而更具王朝国家“大一统”特点的道教传统、扶乩传统则乏人关注。其实，在今日的南部边疆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有着不同时间深度、与不同中心相联系的文化传统（如道士、麽公、麽婆、扶乩等各自的传统）在同一时空展演。笔者在广西大新县、靖西市观察获知，当地的仪式专家主要有三种，即道士、麽公与麽婆。三者的区别，即使一般人也可轻易地看出来：道士使用汉字写成的经书，念诵时用桂柳官话；麽公的经书用土俗字^[34]写成，用本地话壮语念诵；而麽婆则没有经书，用铜链敲击声来伴和吟唱。根据笔者的研究，麽婆仪式是华南地区较为古老的底层传统，麽公仪式是唐宋时期产生的壮族次生文化传统，道士仪式则属更为晚近（明清时期）的王朝国家“大传统”。

不过，那些与王朝国家“大一统”相联系的传统，总是占据地方文化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这样也就建构了一种文化权力的层级与体系。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举行的太平清醮仪式，道士、麽公与麽婆共同参与，但是道士主导仪式的时间过程与空间安排，道士与麽公、麽婆之间还存在灵力的传递关系。

据此，可以总结、提炼出“多层一统”的概念：地方的信仰与仪式是在不同时间段内借由不同方式层叠形成的，这一层层的信仰仪式传统可能跟不同的地域中心相联系；在层叠之时各种传统的边界可能相互渗透，但仍清晰可辨。地方的信仰仪式文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而是融合的层级与体系。那些代表“大一统”的传统往往在这个层级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形成对其他文化传统的一种统合之势，并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服膺。“多层一统”既可以说明国家的整合，也可以解释地方的延续。

三、余论：国家整合和地方传统

讲了这么多国家整合，这是否意味着各地的地方传统必然走上同质化、“标准化”的道路？通过前述研究，可知答案是否定的。今天我们在当地仍能观察到不同文化传统在同一时空中的共存、共生。不同文化传统差异仍大，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没有被“标准化”。本文认为，文化传统是不断叠加的，新的覆盖旧的，但这并不等于斩草除根，推倒重来，旧的完全没有了生路，新加的一层可以运转良好，原来的也可以继续存活。

当然，有时候要揭示这些层叠的文化传统（如历史叙述）亦并非易事，因为后加的会对先在的作有意无意的涂抹、修改，另外这些文化传统也可能早已相互渗透、融合。鲁西奇曾提出“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概念，主张通过作者身份背景考证、史源分析等方法区分出古史系统中的地域传统^[35]。斯科特则走得更远，主张从生计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发掘“不被统治者”的历史，在他看来文字书写本身就是遮蔽历史的手段^{[36] [37]}。本文认为，借由人类学的信仰仪式与口头传统研究，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至今仍存的地方传统。

关于信仰仪式研究，Erik Mueggler 和马健雄分别对云南彝族、拉祜族信仰仪式与集体记忆的研究堪称成功的案例^[38]；关于口头传统研究，笔者曾撰文分析有关依智高的传说故事^[39]。依在王朝官员、士大夫眼中是蛮夷、叛臣，在部分历史学家眼中是农民起义领袖，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眼中又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那么当地人究竟如何记忆并看待依，特别是依起事的失

描述，显示仪式所处理的是社会延续的问题；经由对仪式唱词的分析，说明麽婆如何用宗教语言透过仪式行动解决社会延续的问题。萧梅在《唱在巫路上——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麽婆（麽婆）举行的四种仪式，并以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在麽婆音声力量的来源、音声与附体的双向关系、麽婆成巫与传承及其社会角色的生命史等方面作了探索。

¹ 研究者称之为“方块壮字”或“古壮字”。这种文字大多借用汉字的偏旁重新组合而成，用来记录壮语的发音与语义。比如“𠬞”字是水田之意，其发音为“那”。1989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共收录四千九百多个这样的文字。

败呢？其实当地人是用一种以“时机不巧”为母题的传说故事来述说依的：依并不是实力不济，他其实非常强大，只是因为无意触犯了法术禁忌，才最终功亏一篑。

历史上族群接触频繁，“叛乱”较多的南方边缘地区，至今广泛流行着此类“时机不巧”型“叛乱”失败故事。这里我们可以读读朱晴晴在黔东南侗族聚居地黄封地区采集到的类似故事：

从前有一个反王，他的力气非常大，可以将很粗的竹子连根拔起。他一直都在修炼一种本领，一旦成功，就可以将一支巨箭一下子射到京城去，将皇帝射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刻苦修炼，他终于快要大功告成。于是他告诉自己的母亲，第二天鸡叫的时候一定要叫醒他，这样他就可以趁皇帝上早朝的时候，一箭把他射死。因此他的母亲就一直未睡，等待着鸡叫。但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她实在是太困了，就拿起筛子开始筛米，这样一来鸡听到筛米的声音就以为天亮了，便开始叫了起来。她就叫醒儿子，告诉他天亮了。反王就拿起弓箭，射向紫禁城，但那时皇帝还没有上早朝，箭正好射到了龙椅上面。皇帝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四处派人查找元凶，结果查到了黄封，抓住了反王，将其杀死，其血染红了一条小河^[40]。

从这种地方传统我们可以读出“失败者”的些许心态与声音来，尽管这种心态是那么微妙，尽管这种声音经过层层覆盖。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有的边缘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传统，从用他们自己文字写成的史料里面我们也能读出不一样的历史传统来。下面一段史料节选自原文为傣文的《勐泐王族世系》¹^[41]，从中可以体会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段内，西双版纳傣人（傣泐）如何想象与周遭人群的关系，亦即他们的“世界观”：

帕雅英（天王）命令密柱甘嘛底麻稳（天神）说：“你变成两只孔雀下凡，一只飞到密底哈纳管（中国），告诉天朝汉王；一只飞到勐戈桑勐漫（骠国），告诉骠王。天朝汉王住在北方，是民主选举的哈先（巴利语，即国王），是父王。骠王住在南方，也是民主选举的国王，是傣泐的母亲。你必须在明天天亮前同时到达两地，站在宫廷上，同时呼喊两个国王的名字，要他们同时赶到勐巴腊纳西因（景洪古称，下同），共同商讨大事；派出使者到勐南掌（古老挝）勐龙帕王（即今琅勃拉邦），找回勐泐王的后裔，在勐巴腊纳西因建立佛寺。”并对孔雀说：“若天朝汉王与骠王三天后不按时到达勐巴腊纳西因，你就把他们的头炸成七块，天诛地灭。”^[42]

总之，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应是我们众多研究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想出一套富有动力学的解释机制，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提出“多层一统”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将继续推进这个概念的论证。

参考文献

- ^[1]杜树海，边疆构建与社会变迁——宋明以降中越边境广西左、右江上游流域的历史与记忆 [D]. 广州：中山大学，2011.
- ^[2]张长东，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理论发展 [C] //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07.
- ^[3]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 [C] //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29.
- ^[4]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M].北京：三联书店，2008.

¹《勐泐王族世系》据说记载了西双版纳等地在第一代傣王帕雅真（12世纪）之前的历史，但是可以发现其充满神话色彩。原文是传抄本，作者与创作年代无法确认。“勐泐”即“泐国”之意，为西双版纳傣人在宋元时期的联盟国家。抄本虽名为“勐泐王族世系”，其实是在追溯勐泐前史。

- [5] 蒋俊, 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8; 罗彩娟, 从“归顺”到“靖西”: 边疆地区壮族的国家认同研究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
- [6] 高奇琦, 宏观民族分析的微观基础: 西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评述及补充 [J]. 民族研究, 2012, (2).
- [7] 苏力, 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2).
- [8] 刘志伟,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J]. 历史研究, 2003, (1).
- [9] 陈贤波, 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Fei Huang.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8.
- [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叡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6.
- [11] 何农林编, 足迹——广西大新县文物普查保护资料汇编 [Z]. 广西大新县文物管理所, 广西大新县博物馆, 2006.10.
- [12] 杜树海, 宋末至明初广西左江上游土酋势力的动向——从《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看祖先叙事的创制 [J]. 民族研究, 2013 (4).
- [13] Mike Crang, 文化地理学 [M], 王志弘等译,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2003.52.
- [14] 钦州志(道光) [M]. 卷一《山川》
- [15] [27] 镇安府志(乾隆) [M], 卷八《艺文志》.
- [16] 杜树海, 清代边疆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与文化面貌的转变: 以广西靖西县墓碑、石刻等历史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J], 社会, 2016, (1).
- [17] 酈道元著, 陈桥驿注释, 水经注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565.
- [18]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 [M], 卷二百五十,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3624-3626.
- [19] 藤县志(光绪) [M]. 卷二十《艺文志》.
- [20] 申时行等, 大明会典 [M]. 卷六, “续修四库全书”第 78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113-114.
- [21] [22] 田汝成, 行边纪闻 [C] // 滇考、行边纪闻、雷波琐记合订本, 台北: 华文书局, 1968: 449.451.
- [23] 张廷玉等, 明史 [M]. 卷三百一十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265.
- [24] [36]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73.73.
- [25] 马琦, 国家资源: 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6] 大清五朝会典·嘉庆会典 [M], 卷十四, 北京: 线装书局, 2006.189.
- [28] [32] 杨锡绂. 四知堂文集 [M]. 卷五. “四库未收书辑刊”玖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152.148.
- [29] 钦县志(民国) [M]. 卷三《民族志》.
- [30] Steven B. Miles.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26. 241.
-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贵州安笼总兵宋爰等奏在永丰岵赖寨民卢全家缉获散符控害的黄三、韦阿三、罗阿韦、罗龙, 打死王阿利, 续获王阿耳、王文甲、王文魁、阿保、郭师傅审办释放等有关折 [Z]. 全宗 4 卷号 2074 号 1.
- [33] 曹本冶,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下) [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328-494.
- [34] 潘其旭、覃乃昌, 壮族百科辞典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3.410.

- [35] 鲁西奇, 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 [C] //鲁西奇, 人群·聚落·地域社会: 中古南方史地初探.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鲁西奇, 层累、汇聚地造成的地域古史系统——以先秦越国的历史叙述为中心 [J]. 历史人类学学刊, 2013, (2).
- [37] 严庆、刘赫, 赞米亚: 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9, (03).
- [38] 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Jianxiong Ma. *The Lahu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A Response to Ethnic Marginalization on the Fronti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39] 张先清、杜树海, 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
- [40] 朱晴晴, 移民、市场与社会——清代以来小江地域文化的演变 [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1, 82-83.
- [41] [42] 佚名, 勐泐王族世系 (汉文、傣文对照) [M], 刀国栋等译,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7. 江应梁序.3.

【学术访谈】

移动的宋辽边疆

——英国伯明翰大学史怀梅教授学术访谈¹

董永强²

一、前言

史怀梅 (Naomi Standen), 1994 年英国杜伦大学 (University of Durham) 东亚研究系博士毕业, 学位论文题目为《从中原北部到辽的越境举动: 约 900-1005》(*Frontier Crossing from North China to Liao, c. 900-1005*), 此后, 历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College, Oxford) 中国史初级研究员 (1993-1997)、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苏必略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 历史系亚洲史副教授 (1998-2000)、澳洲新堡大学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历史学院中国史讲师 (2000-2007)、英国新堡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 历史学院中国史高级讲师 (2007-2011), 现为英国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艺术与法律学院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历史与文化系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 中古史教授 (2011-)。目前, 她致力于欧亚北部边疆问题的研究, 主要关注中古时期东北亚越境者、边界、边疆之间的互动关系。执笔《剑桥中国史五代宋史》(五代) 部分, 2007 年出版专著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此书 2007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学界有很大反响。相关评介可参见 Richard L. Davis, "Book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7(2007): 527-528; Paul Jakov Smith,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2008): 242-250; 张帆, 〈书评: Naomi Standen,

¹ 本文刊于《汉学研究通讯》第 38 卷第 4 期; 转载自“宋史研究信息”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CUDtJd20Sg4VhwxCRWGeg> (2020-2-27)。

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汉学研究通讯》27.3(2008.8):57-58;李怡文,〈书评: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历史人类学学刊》8.2(2010.10):152-155;吴国圣,〈不羁之忠——评介 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新史学》22.3(2011.9):209-244)。2015年该书被译成中文版《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她曾发表论文“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等数十篇,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2016年2月3日,在伯明翰大学历史与文化系史怀梅教授办公室,笔者就宋辽边疆地区的越境现象、身分认同、族群概念、英国的汉学与史学以及她个人对中外史学家治学方法的想法等问题,对她进行了学术专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并附其论著目录于后,以飨读者。

二、访谈内容

董永强(以下简称董):首先,祝贺您的著作汉译本出版¹。这本书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它主要是以汉人为主的辽南人(Liao Southerner)和跨界者为研究对象,探讨政治、军事变化对边界地区官员和将领忠诚意识、族群认同的影响。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的?

史怀梅(以下简称史):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对宋辽关系十分感兴趣。我不断发现许多文献中记载着类似的人群,正如我之前研究早期欧洲中世纪史时所关注的人群一样,他们曾做着同样的事情。攻读大学时,我研究的是西法兰克王国(West Francia,即今法国)和安达卢西亚(Al-Andaluz,即今西班牙北部)的关系²。他们以学识渊博闻名于该地区,我读本科时曾研究过这个家族。有趣的是,巴努·奎西是穆斯林,西法兰克是基督教徒,但是很显然,宗教、族群联系和语言与他们的立场变化没有关系。因此,他们有时乐意效忠于基督徒王国——法兰西国王,有时他们乐意效忠于穆斯林王国——安达卢斯国王。他们并不在乎改变立场。

我注意到宋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汉族官员中,有人事宋,但并非宋人。当我观察五代时,这个现象就变得很清楚。那些起初效忠于梁唐晋汉周之一的人们,此后效忠于辽。他们也不在乎改变立场。欧洲与中国情况相同,非常相似。所以,我对这些生活在边境地区、边境地带的边疆人群非常感兴趣。我开始寻找可以研究的人群,即那些跨界者,那些尽可能多地可以从两边都能研究的人群。因此,我想获得有关同一个人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既有来自五代或宋朝这边的,也有来自辽这边的。当然,这很难,因为这段时期的文献互相承袭,史源错综复杂。³但是我发挥自身优势,设计了一种文本比较方法,利用文献之间的对比关系,试图看到10世纪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很难看出的,但我试图解开同一段历史的后续版本,看看在记载中剩下什么,看看10世纪的历史有可能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很明显,在做这件事上有困难,甚至还有问题。

董:在10世纪欧洲和中国北部的现象之间,您发现了什么?

史:它们看起来是相似的,虽然并不完全相似,但足以引发思考。

董: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您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中古史?

¹ (英)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² (1984-1987年,史怀梅就读于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Queen Mary College),并以论文《秃头查理与安达卢斯:边疆政治与外交关系》(Charles the Bald and Al-Andalus: Frontier Politic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获得历史学一等学士学位。安达卢西亚(Al-Andaluz)为西班牙穆斯林统治区)。我注意到在那个区域里有些时常改变立场的家族,特别是巴努·奎西(Banu Qasi)家族。

³ 为破解这些难题,史怀梅首先探讨了“史书编纂中的边界(historiographical boundary)”问题,并根据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讨论,厘清了《辽史》的史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相互比勘。详见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一章“史书编纂中的边界与10世纪的文献”,页47-53。

史：我的学士学位是研究中世纪早期欧洲历史。在攻读本科学位第一年，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节选的英文版《庄子》，即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¹ 翻译的《庄子》。读过此书后，我发现它和我以前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我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觉得差异真的很有趣。因此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想知道为什么那里的人们可以产生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这些惊人的想法。所以，我设法将研究范围稍微向东方推进了一点，并决定攻读中国中古史（Chinese Medieval History）的博士学位。在中世纪欧洲历史方面，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学位，然后我去了台湾学习汉语，所以我可以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中国历史是与众不同的，正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引起了我的想象。

董：《庄子》的想象神奇、玄妙、超绝，而且充满了智慧。因此，很难读懂。就断代史而言，您认为您的英国同行和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差别？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您认为会是什么？

史：很少有英国学者研究中华帝国史（Imperial Chinese History），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是少数，也许 5 到 10 位，他们大多关注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史，主要是地方史、区域史，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因为存在大量的我们才刚刚开始研究的初级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由文人士大夫们制作的。而且，我认为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历史学方法。因此，在英国，为那些研究中国的人提供的传统培训就是学汉学、学中文。从事汉学的技能非常重要，但它们不同于历史技能。我认为越来越多在英国从事研究的学者开始使用更多的历史方法来研究帝国历史。而不仅仅是汉学技能。这给了你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因为当今的历史研究要求人们对某些理论、历史理论和其他类型的理论有一些了解，并采取一整套不同的方法来做，而不仅仅是关于文本解读。

现在有很多人在英国和美国学习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人想和其他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学家交流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英国的历史系过去主要研究英国和欧洲的历史，确实不涉及其他。但现在在大多数历史系都有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有时更多。他们几乎都是现代主义者，不关注中华帝国，而是自晚清进入到现代时期。因此，尤其要告诉这些人 and 他们的同事，中国历史是多么重要，而且历史系确实需要研究中国历史。不只是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历史正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但这对于中华帝国史来说并不真实。因为它研究的是前现代时期，在一些地方它仍然是在中国学系（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但确实有一些人，像我一样在历史系。他们也想告诉那些研究英国、欧洲、美国、非洲等等历史的同事，中国史也是重要的，他们需要在历史系中有人研究中国历史。

董：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大学里同样存在，历史系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历史，而不是俄国历史或者美国历史。

史：我读大学时，英国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只关注英国和欧洲，也有点关注美国。但自从我工作后，研究范围有所扩展。现在大多数院系都在努力变得更加全球化，尽量更多地涵盖世界各地，但这个过程相当缓慢。

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传统史学中的汉化模式和汉族中心观的局限性，逐步纠正对征服王朝和异族文化的偏见，并用新的视角来客观讨论突厥、契丹、蒙古等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地位。作为一名一直关注欧亚草原民族和族群文化的专家，您认为以往的中西方关于边疆族群的研究有什么理论缺陷？西方的民族认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¹（美）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中文名为华兹生，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主要致力于中日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对中国哲学和史学著作也有涉及。他翻译的《庄子》被收入大中华文库出版，同时也入选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诺顿世界名著选集》，1997），成为中国典籍在美国译介的经典之作。

史：这真是个好问题。我认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及其他地方的边疆问题时，主要是种族的起点问题。如果你从种族观念出发，你就必须探讨族性（ethnicity）。¹

因此，有一种假设，即民族认同必须始终是前现代时期人们的主要身分。**可能对现代人而言，民族认同是他们的的主要身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前现代人也同样。我们就不能不去探讨“种族对他们来说是否最重要”这个问题。**我认为问这个问题很重要，也许答案是“种族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设定了答案，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无法思考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例如，我们不能思考其他类型的身分对他们来说是否更重要。也许他们的社会身分更重要。也许他们是学者官员，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工匠，这些身分更重要。或许他们的政治身分更重要。也许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统治者，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对他们来说更重要。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能够询问他们。因为我们不能妄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我们认定种族是最重要的，把可能一切都被归类为“汉人”或“非汉人”。这意味着，除了我刚才描述的问题之外，它还**假定你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谁或者什么是“汉人”，谁或者什么是“非汉人群”。而且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另一个问题是**把所有的“非汉人群”属于一类，所有的“汉人”属于另一类。**所有的非汉人群被混在一起，但它们彼此不同。汉人一直都是汉人，非常特别。如果认为中国性重要，而非中国性不重要；如果将人群分为“汉人”和“非汉人”两大范畴（categories），那么就必须思考如何定义他们？汉人是因为他们是汉人后裔，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文化而是汉人？譬如，如果你用中文名字，并声称要像一个汉人一样行事，你就会变成汉人吗？

问题是，这两个范畴都被使用了。有些学者会用其一。当祖先们的定义适用于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时，他们就会使用该定义；或者当使用中文方式的定义适用于他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时，他们就会使用中文名称的定义。因此，根据你所说的，你可以使用这两个词，也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定义。所以，如果你想声称 10 世纪的中国边疆人群不为非中国统治者工作，那就没有中国人会为一个非中国统治者效忠。如果你想宣称这一点，那么你就定义了“边疆人”，你在强调边疆是一个混合民族的地区，因此，边疆的人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中国人会为非中国人效命，因为那些人不是中国人，这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话。

如果你想宣称非中国统治者变得中国化，那么你强调的是他们用汉名，用汉人政府结构等等，突然，他们成为中国人。当然，唐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起源于混合种族，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历史学家真正喜欢说：“但他们是中国人”，所以这是非常矛盾的。人们对此非常担心。我想人们很担心：“这些人是中国人，那些人又不是中国人？”而不是说：“我们不用担心。先让我们看看他们做了什么。让我们试着去研究到底是什么真正激励了他们。也许是他们的民族身分，但也许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不要坚持认为，他们行为的动机一定是他们的种族认同。

董：当我们读唐代的一些历史文本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一些非中国人在西部地区可以改变他们的身分。您认为西方的身分理论是否适用于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改变身分的分析？

史：是的，我认为当我们看到你刚才描述的案例时，必须非常小心。我们怎么知道你所探讨的人自己想被认为是“汉人”？也许他们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使用我们的范畴。西方有许多不同的相关理论，但也许最有用的，是人们有多重身分。所以，他们可能有国家认同身分、地区性的身分、阶级身分、职业身分、性别身分等等许多不同的身分。他们可能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一个或多个身分。因此，他们将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选择某些身分。譬如说，我是英国人，英格兰人，来自伦敦。我要说的是，我的身份取决于我在和谁说话，如果我跟美国人说话，我可能会说我是英国人。如果我和苏格兰人谈论苏格兰独立，我可能会说我是英格兰人。如果有人问我

¹ 史怀梅认为，不管前现代是否存在“族性”观念，人们都一致认为“族性”观念在前代至少部分上已经有所规范，并且假定它决定人们行为时起了重要作用，决定了包括从文化标准到政治效忠领域内人民的行为。

从英国哪里来的话，我可能会说我是伦敦人。所以我使用的每个身分，都取决于我所处的环境。我也可以使用我的阶级身分，或者我的性别身分，这取决于情况和与形势相关的东西。因此，当你在思考情况时，要关注多重身分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许多个身分，他们会选择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是最直接有用的某个身份。例如，可能是你唐人，属于非汉人群，取汉名，学写汉字。但他们也可以继续沿用自己的、原始的、仪式的习俗。他们可能有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所以，这取决于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和一个中国皇帝交谈，他们可能想要强调他们能读和写中文。如果他们在和亲戚谈话，他们可能会说让我们开个派对，吃传统饮食。

董：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的辽人、宋人、金人等这些族群，跟民族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做历史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的时候，nation, ethnic, people 这些概念到底该怎样使用，您认为用哪个更加合理？

史：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是身分被建构的想法。它们通常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不能认定生于河南的人就是中国人。出生地这个要素很重要，但它不一定会对那个人的一生都重要。所以我想，辽和金继续唐的实践，更重视的是人们所能做出的贡献，而不是他们的种族或文化背景。例如，唐朝重用高句丽人为将领，辽则用宋人为将领等等。在这一点上，宋似乎是不同的，可能也是 1005 年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时期的文人精英愈加强调“夷夏之别”，越来越多地强调宋人和辽人之间的不同。因为他们是敌人，宋想要把辽“他者化”（othering）。¹

也许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我认为，这是一些需要思考的重要想法，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些事情应该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我们不应该假设答案。如果我们考虑的是少数群体，使用“少数民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定有少数。如果你谈论少数民族，那么你就假定汉人占多数，所以汉人总是处于中心地位，不可能以平等方式看待其他族群，无论他们是谁。如果你使用“族群”这个词，你可以将他们视为独立于汉人的族群来考虑，不必总是和汉人有关，可以考虑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考虑突厥人与藏族人的关系，如果与汉人无涉的话，根本不需要考虑汉人的存在。所以，我认为避免使用“少数民族”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如果用这个词，就永远逃不出胡汉两分的分析模式。它假定大多数人口是中国人。当然，唐代人口极其混杂，会忽略使用“少数民族”，因为它假设有“汉人”，而“汉人”其实是多种族混合而成的。

董：读您的书，让我重新思考如何在我的研究中运用“民族”概念，因为在唐代，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用现代概念来分析前现代情况是否合理？

史：这非常困难。如你所言，“民族”是现代概念，很多研究试图在一个没有真正用过它的历史时期探讨它，如你的课题名称是“唐代西州基层社会与民族治理研究”。所以，如果你只是从基层社会的视角去思考治理问题，那么你会忽略族群问题，而没有尝试和谈论族群问题，只是关注治理和基层，而不用担心族群是什么。“族群”对你的研究有贡献吗？他们有什么贡献？这些是你思考的核心问题。我倾向于用辽来指一个政治单位，它当然是多族群的，有汉人、契丹人、突厥人、沙陀人、回鹘人，是个多族群混合统一体。所以，我将政治单位与文化团体等其他团体严格区分开来。我更倾向于探讨文化单位，而不是族群，因为文化是你讨论的。

董：在正史上，突厥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因此，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我们从古代历史记载中仅仅知道突厥与中原不同。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文化了解甚少，关于他们的信息和

¹ “他者”是在现象学中同者相对的概念。他者的形成必须发生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而且对立的双方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同者利用武力、语言、意识形态对他者行使霸权，对其进行排挤、支配和控制。他者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的过程称为“他者化”。

材料非常有限。然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突厥游奕部落派人修护堤堰，引水灌溉农田。我怎么能用原始材料和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么少的信息呢？¹

史：吐鲁番的突厥人修堤堰，浇农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种方法是说：**让我们把研究人群的所作所为放在首位，而将族群标签放在第二位**。也许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场景：这里有一群人，被称作突厥人，他们修渠灌溉，他们养马，他们贸易，或者做其他事。虽然你能得到一个被称为突厥人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单。但你无法假设你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你必须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人们开始探讨，得从那里开始建构。因此，我们经常犯的毛病是，有突厥人这个范畴，并且认为文献告诉我们的某些事，是所有突厥人都会做的。但是，他们当然并不都那么做。你可以将它作为因素之一，与出土文献记载的人们实际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比较。它们是否匹配？或者它们在哪里匹配，哪里不匹配？也许他们并不是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人们正在做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假设任何一个突厥人都会和其他突厥人一样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们也不认为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汉人中有些人是文人士大夫，有些是农民，有些是工匠，有些则是士兵。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假设每个突厥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呢？我想说的是，**族群研究首先应该从文本中的实际内容开始，然后搁置而非忽视其标签，而是将其放在一边，放在第二位，专注于文本告诉我们的研究群体的行为：他们在做什么。**

董：这答案很棒，但不同文本之间有时会有出入。

史：这是历史文本的问题。编撰历史很困难，史家们不得不从某种视角出发修史，形成历史记载的文本。但是如果试图了解那些被书写者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我们唯一能依赖的就是史家们的记述，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依赖于史籍记载告诉我们被书写者的言论，因为很多时候史家编写历史以弥补历史人物的言论，是编撰者创造了这些话。所以这是不可靠的，但我们可以更自信地描述某个历史人物，比如，他给某人写了一封信。他杀了某人。他又投靠某人。他参加了修渠劳动。在小心求证的同时，对记载下来的他所做的具体事，我们可以稍微有点自信。

董：在我看过您的书之后，我很欣赏您用来分析种族和身分的框架，我想把这个框架应用到我的研究中。然而，由于时间和材料的限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为我的课题制定一个新的框架。您是如何建构分析框架的？

史：这非常困难，为它我花了很长时间。在读博士时，我逐渐设计出研究所需的分析框架。但是，当我为本书重新修订博士论文时，我把所有东西都颠倒过来。实际上，我要从另一个地方开始，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我改进了分析框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提前创建的单一模式的分析框架。

我的出发点是：我们能弄清楚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是怎么看待忠诚的，他们又是如何从忠诚中获益的。那是在阅读一些传记并将之与欧洲的案例比较后发现的一个问题。现在，我正在用一个新的框架来考虑它。忠诚源于对国家边界的担忧和不满，以及对利用国家政治实体作为前现代历史的主要基石的不满，而我们仍然经常这样做。

很明显，像佛教这样的事物不注重国家边界。那么，当佛教与国家边界无关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佛教这样的话题呢？你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辽的佛教，这是高句丽的佛教，这是西藏的佛教。”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并不是很有帮助。出于政治原因，研究者常常人为地把它们分成不同的单位。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如此重要？所以我正在尝试思考研究这些问题的新方式。因此，我认为，要想形成新的框架，就必然要抛开旧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真正批评。追问自己：“它们不起作用。那么有什么别的我可以用的吗？”“即使它带我去一个非常

¹ 两事见吐鲁番阿斯塔那 509 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和《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文为计会定人行水灌溉事》，文书内容见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 4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 315-317。

奇怪的地方，它可能会做什么。”要努力去尝试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每个项目都需要自己的框架，而且需要采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敞开胸怀，变得非常非常挑剔。我有这样一个框架，让我思考种族问题。但是，如果它对这些人没什么用。那么，我能不能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人呢？使用新的范畴，让它更有意义。所以我试图深入到我所读到的人的头脑中。我正在研究谁？好吧，他们是不是从种族角度来思考的？我能确定他们是怎么想的吗？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所以在我的书中，这让我想到，忠诚似乎是激励他们来到这的原因。他们把忠诚放在哪里，似乎是驱使他们的原因。所以，我在寻找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那么，是什么让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呢？我能看看里面的图景吗？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在使用同样的东西（也就是忠诚）。所以我愿意重新审视分析所使用的范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就不会认为你已经知道这些范畴是什么了。你说，“实际上，这类分析是行不通的。有什么我能用得更好的吗？”但是这并不容易。

董：在边疆民族地区，当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时，很难只使用一个分析框架。

史：是的，所以，就你的研究来说，你要自问：种族概念是有用的吗？它起作用了吗？这是人们曾在使用的东西吗？需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提出。不要想当然。同时，我也会想：政治在这里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人自认为是唐代行政区的一部分吗？或者他们认为是突厥的一部分？这与政府机构、行政单位有关？还是与忠诚有关？如果你在谈论粟特人，尤其是它真的与经济学有关吗？它真的是与贸易网络和人群关系相关吗？也可能根本不是。那什么是它们真正的意义？是契约吗？他们是否考虑与人签订契约？与死者签订合同？还有什么是可以谈论或思考的？与阶层有关吗？人与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吗？我们是下层民众，我们就必须做文人告诉我们的，或者我们必须按照官员告诉我们的去做？还是我们必须做我们的首领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会尽可能考虑使用更多不同范畴。你能看到，人们曾使用多少种不同的范畴，然后你可以开始说：哪个更行得通。在你的文本中，哪个范畴似乎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关心的事物中。不是在我们脑子里，而是在文本里。但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后退一步，因为现实世界是由一切通向我们的事物所塑造的。

我试着想象过去的人们有不同的方式来构建这个世界。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总是有意义的。例如，宗教可能是重要的。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建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学生中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我们试图让学生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对人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让学生了解这一点是一项重大成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家。但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也许还有其他范畴在过去是重要的，即使它们现在不重要。

董：现在学术界提倡跨学科研究，在您思考书写全球中世纪史（Global Middle Ages）时，您有没有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或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如果有，您能举个例子吗？

史：**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是喜鹊，他们从任何来源获取主意（idea），只要它们行之有效。**在做全球中世纪课题时，我们借用了大量不同的想法。比如：我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物质文化。不是来自物质文化上的文字，而是城市规划和陶器，以及那种真正的考古学材料。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发现从非洲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出有关政治权力的理论是非常有趣的。因此，非洲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些非常新颖的政治权力观，我认为这非常有用。他们帮助我思考我所关注的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权力。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本质、权威和合法性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可资借鉴。

董：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更多采用传统的方法，而不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但现在也强调跨学科研究。

史：有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喜欢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进行研究。对很多学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明智、而且优良的工作方式。但对于像“全球中世纪史”这样的新话题，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研究。我们还在努力研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是一个新领域，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但这个领域，在思考关于事物的思维方式方面，其他学科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是有用的。

董：在中国未来的中古史研究领域，您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史：目前在丝绸之路上做了很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知道得很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考古工作也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在北方。我会特别感兴趣看到北方的考古进展。譬如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考古成果。目前，在东南部的宋代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这是所有材料的所在地，也是材料能所反映的地区。但事实上：北方发生了什么？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关于金、辽、蒙古的著作，因为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研究不多。还有元代和元以后。人人都研究忽必烈，但没有人研究元朝后期，所以很少有人研究元代中期和后期，所有学术语言中都是如此。

董：相比其他朝代，可资利用的数据的多寡是非常关键的。

史：但元代有很多书面材料。元代是真正的谜，因为元代确实有文字数据。这并不难，但人们不学习它。

董：您认为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称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史：**我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质量、技能和习惯就是怀疑主义。不相信所读到的，批判并检验所面对的。这并不是说应该考虑它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我认为，真实性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他们应该阅读并怀疑：“这是真的吗？这真的发生了吗？”“写这个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个？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想让我明白什么？”“如果我知道，那么这能帮助我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报纸报导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告诉你，他们编故事，试图告诉你一个特定的解释。但你必须剥离解释，并告诉自己说，事实上，在他们的解释背后有另一个故事，也许这才是我更感兴趣的。其次需要耐心和韧性。即使看起来不可能，你也要坚持下去。最后还需要有想象力。你必须能够试着把自己放在古人的立场上去思考。这样想：我是一个现代人，但我正在尝试想象生活在那个世界，一个历史上的世界，想象它是什么样的。

董：如今，许多研究历史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找不到工作。他们将不得不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获得更高的学位，他们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在他们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之后，他们仍然不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所以有些人说学习历史是没有用的。您认为，历史对于普通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史：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本身：历史如何对人们有用？另一个是历史学学位对人们有用吗？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历史对人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它有助于给人们一些感觉：其他人对事物的想法、做事的方式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们必须面对这种差异。

就历史学位而言，30年前在英国，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喜欢历史，出现了一场大恐慌。她认为历史是无用的。所以历史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列出了一份历史研究带给学生的技能清单，今天仍然在用。现在大学都有开放日（open day），为申请者攻读历史学位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史学是好的：**史学使你能够处理大量的材料，了解它们，用大量不完备的材料来进行逻辑缜密的论证。史料总是不完整的。但你仍然必须能够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并根据不完备的材料进行论证。史学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这在很多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你从来不知道所有的信息。你必须能够根据你所拥有的证据得出合理的结论。所以使用证据来构建一个特定论点的能力：这是史学赋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

国家，许多雇主看重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技能，因为他们希望人们对事物能够批判和思考，能够用证据建构一个清晰连贯的论点，而不用担心他们信息不全。

董：常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¹对某些人来说，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真相。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任何真实性。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史：我认为在英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历史不是寻找真相。真相不止一个。历史可能有很多真实的解释，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发现一个单一的真相；而在于就历史进行辩论、讨论和对话。并且要理解，许多不同的阐释方法可能都是有效的，因此一个历史事件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合理解释。有效与否，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想用它做什么，你选择了哪种解释。但它们都是有效的。并不是每一种解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写了糟糕的历史，误用了证据等等，但有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有效解释，它们确实以一种完全合理和明智的方式使用证据，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都是完全合理的。只是你可能会从一个角度说，“我赞成这个解释”，我可能会说，“我支持那个解释”。这没什么。因为你们可以互相讨论，为什么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让我思考我的解释，然后我会说一些能让你们思考你们的解释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学习了。因为历史不是固定的。**对历史的研究总是在变化，而且总是流动的。它是活着的，一种活着的东西。我告诉我的学生，当我们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学到的最多。**有礼貌地，有证据的讨论历史，证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解读证据有许多不同的可能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是正确的。因此，可以从人类学视角去解读，得出一个答案。也可以用历史地理学视角来解读，可能会得出另一个答案。以此类推。然后你把这些答案放在一起，会认识到整个事物的每个不同部分。

附录：史怀梅主要论著目录

(一) 专著

2009 “The Five Dynastie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Part 1, ed.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8-132.

2007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二) 编著

2018a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Annual Supplement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三) 论文

2018b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Introduction: Towards a Global Middle Ag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2018c Conrad Leyser, Naomi Standen and Stephanie Wynne-Jones,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Narrative: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History,”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60.

2018d Naomi Standen and Monica White, “Structural Mobiliti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8-189.

2018e “Followers and Followership in Northeastern Eurasia, ca.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s ca 250-750CE*, ed. Nicola di Cosmo and Michael Ma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0-418.

¹ 有人认为此话出自胡适，实为谬传。相关研究参见谢泳，“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新民周刊》51（2003）。

- 2017 “The Attraction of Opposites: Owen Lattimore and Studies of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2009: Proceedings of the XXI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Limes Congress), ed. Nick Hodgson, Paul Bidwell and Judith Schachtmann (Archaeopress), pp. 357-364.
- 2013a Naomi Standen and Gwen Bennett, “Difficult Histories: Chang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Liao in PRC Regional Museums over Three Decad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8.6(2014): 1519-1565.
- 2013b “Foreign Conquerors of China,” *Demystifying China: new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history*, ed. Naomi Stande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33-40.
- 2011a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The Framing of the Liao Dynasty (907-1125) in Chinese Sources,” *Asia Major*, 3rd ser., 24.2(2011): 147-198.
- 2011b “Who Wants to be an Emperor? Zhao Dejun, Youzhou and the Lia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d. Peter Lor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5-46.
- 2011c Gwen Bennett and Naomi Stande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Views of the Liao (10th to 12th Centuries) Borderlands in Northeast China,” *Places in between: 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Borders and Borderlands*, ed. David Mullin (Oxbow), pp. 80-98.
- 2007 Naomi Standen and Francis Jones, “Revealing Alternatives: Online Comparative Translations of Interlinked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Creating and Digitizing Language Corpora: Vol. 2, Diachronic Databases*, ed. J.C. Beal, K.P. Corrigan and H. Moisl (Palgrave), pp. 172-195.
- 2005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ed. Michal Biran and Reuven Amitai (Brill), pp. 129-174. (Japanese trans. Yamane Naoki 山根直生, 2018).
- 2003 “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Wyatt (Curzon Routledge), pp. 160-191.
- 1999a “(Re)constructing the Frontiers of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pp.55-79. 1999b “Introduction B. Nine Case Studies of Premodern Frontiers,”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pp. 13-31.
- 1997 “Alien Regimes and Mental States: Review Articl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0.1 (1997): 73-89.
- 1996 “From Region of Frontiers to Frontier Regi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Ethnic Identity in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Selected Papers of the 10th Biannual Conferenc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d. Lucie Borotová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p. 18.
- 1992 “Confucian ‘Renegades’ and Images of Loyalty for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pp. 14-22.
- 1991 “Living Abroad: Han Chinese Servants of the Liao Dynasty (907-1125)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Medieval History*, 1.3 (1991): 128-133.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04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